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6月30日第18期 总第228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28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二十二）

目录

【专稿】

唐利 北大校庆120年，回忆文革武斗120天

【述往】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十四）

——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宋翔雁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七）

——不退黑材料的平反·后记

【考证】

樊能廷 “新北大公社”打压“井冈山兵团”的“千钧棒”（上）

——《新北大》关于“红旗飘、牛辉林”的评论

【文摘】

聂元梓 我在文革的漩涡中——让历史告诉未来

【资料】

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总部《关于目前形势的第二号严正声明》（1968/3/19）

聂孙之流就是不折不扣的“二月逆流派”（《新北大报》1968/3/22）

【读者来信】

赵晖谈215期“红色文化”

【本刊声明】

【专稿】

北大校庆 120 年，回忆文革武斗 120 天

唐 利

120 现今是北京大学喜庆的数字，它正在紧锣密鼓地迎接 120 周年校庆，学校早就专门设立了“120”办公室。北大还和另外两个 120 有关：它经历过 120 个月的文化大革命，这在正史中只是草草带过，而其间有 120 天残酷惨烈的武斗，更是鲜为人知。

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

我 1963 年考入北大化学系，1966 年文革发生，到 1970 年分配，文革占了四年多，荒废学业，跟着推波助澜，同时见证了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第一个节点人所共知，1966 年 6 月 1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点燃了全国大乱的火种，文化大革命大浪潮铺天盖地席卷全国。

第二个节点是 1967 年 2 月 15 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成立。

这个日子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揭开了北大分为两派的序幕。从此北大文革从“万众一心”团结在聂元梓周围，矛头向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战，转入了派性内战，自相厮杀。

在北大之前，绝大多数其他院校、单位，早已经两派打得热闹。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把“敌人”搁在一边，“革命阵营”两派内斗自相残杀，这是大闺女坐轿——头一回。北大原本是聂元梓的一统天下，她俨然是毛和中央文革在北大的代表。北大分派是大势所趋，有聂元梓一面大旗，分派反倒比较落在后头。

2 月 15 日，北大三个拥戴“校文革”的全校性组织，“红旗兵团”、“东风兵团”、

“红教工兵团”合成一体，取名“新北大公社”。后来知道，事出有因，是为聂阿姨进入“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做铺垫。2月20日，首都红代会成立，一司、二司、三司各出代表，她一个光杆司令，“老娘的队伍才开张”，就如愿以偿当了“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组长。“红代会”总部设在北大俄文楼。

“新北大公社”成立，聂有了自己的嫡系部队、“聂卫军”，但另一部分人被边缘化，等于打入另册。比如我在的化学系三年级（编号0363），一部分人组成“红三团红旗”战斗队，加入公社，我们其他同学本来一直是支持聂元梓的，却被拒之门外。“新北大公社”自外于平常人，谁能热脸贴冷屁股呢。别无选择，平常人只好另起炉灶，先批评后反对，聂元梓就这样把大批人推到她的对立面。

实际上，后来成立的以反聂为主旨的“井冈山兵团”中，大多数人曾经是她的拥护者，却有的被排挤，有的被抛弃，有的被敌视，有的被打击了。凭着“化友为敌”的本事，聂元梓不折不扣是北大群众分为两派的始作俑者。

第三个节点，1968年3月29日武斗。

北大文革随后的派战愈演愈烈，弄得不可开交，你死我活，观点之争不是本文讨论的要点。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以几百年后的旁观者、局外人的眼光，恐怕不过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上不了台面，进不了史学主流。恰是后来的一个事件，彻底改变了两派斗争的性质，改变了北大文革的走向。那就是由聂元梓一派发动的3·29武斗，延续了120天，从此两派的观点路线之争已经退居其次，占据首位的是给不给井冈山活路的人权存否之战。

“文化”大革命，既不文化又不革命，派斗变成武斗，人类史上也算是一大奇葩。现在动不动就“震惊世界”，北大武斗确是可以算一件，将来一定逃不脱历史学家的法眼，会有人来分析它的历史逻辑，思索它的历史教训。

北大武斗是从“3·29武斗”开始的，延续了四个月120天，时间之长，是北京高校之最，在全国也少见。

不过，零星摩擦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全校的武斗，一点迹象也没有。对骂归对骂，互怼归互怼，口诛笔伐，谁也不会思虑到人身安全之虞。

哪知道，一场突然袭击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聂元梓调来汉中分校武斗有功的高云鹏，3月20日，“新北大公社”成立了以高云鹏为首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几天后，令人无从应对的夜袭就猝然而降。

68年3月28日是星期四，我们等到双方广播台的大喇叭战结束，校园恢复宁静，照常熄灯睡觉，进入梦乡。彼时化学系的男生住在31楼，两派对立严重，宿舍已经自行调换，“合并同类项”，同派的住在一起。不同派的不来往，偶尔见面不是形同陌路，就是怒目而视。化学系“井冈山”编号“03纵队”，是“井冈山”的主力，以三年级的0363最为铁杆，深衔“新北大公社”一些人痛恨。

凌晨一点整，动手了！突然“咚咚咚”急促的砸门声把我惊醒，心里砰砰狂跳，睡眼惺忪，打开一条门缝，楼道灯火通明，两头都竖起了床铺挡住去路，各有几个身穿黄棉衣、头戴柳条帽、手持扎枪的人在把守。中间则有人挨屋砸门，对，不是敲门，伴随着大声吆喝。有人清楼了！我知道大事不好，立刻把门锁上，和同宿舍的一起，拉床顶住门，穿上裤子衣服，夺窗而逃。我们住的是一楼，不费力气，就跑出了31楼。

后来才知道，执行这次行动的是“新北大公社”一支特别能武斗，专门打硬仗的“钢一连”，“新北大公社”化学系“红三团”的人，当晚已经撤了，只是有人负责在“井冈山”男生住的宿舍门上做记号。

化学系四年级的同学住在二楼，不少人翻过窗子，扒着窗台，悬下身体，跳楼逃命。有同学逐个询问统计过，他们有17个人是这么干的，有人摔了轻伤，还有人落地后被公社埋伏的人追打，甚至扎成气胸。化学系五年级的老大哥住在三楼，面临毕业分配，只想图个太平，一般对“文革运动”兴趣不大。他们上百人举着手、排着队，在扎枪的威逼下

清出 31 楼，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都不许带。

现在回想起来，3·29 的血洗夺楼可谓策划严密，完美无缺。大兵从天而降，闪电式的行动。周围多处都有埋伏的武斗兵勇，“井冈山”有人从几处自来救援，都被挡了回去。厉害了，我的社！31 楼半数以上是井冈山的同学，二百多人，都是铁杆，一举被击懵，打散，赶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举动，要缜密设计，严丝合缝，不能有一点闪失。谁是总教师爷？是个高人。这样关系北大运动全局的大行动，肯定需要聂元梓的点头首肯，至少的。

“3·29 武斗”这个说法，其实并不确切，那算不上武斗，没有双方交火，只有单方挨打、无力还手，甚至连对手都没看清，就糊里糊涂被扫地出门。这是一次单方施暴，武力清剿。是的，尽管没有死人，少部分人受了伤，这仍然是一次暴行。“君子动口不动手”式的文革结束了，暴力相对在北大成了主旋律。

三

我们跌跌撞撞、零零星星跑出来的人，不知何去何从，像无头的苍蝇，在 31 楼周围乱窜。那天特别黑，人只有到了非常近才看得清，一边跑一边喊：“你是谁？我是×××。”最后大批人群集中到了 31 楼南侧的空地，找到同班战友。惊魂稍定，交流刚才的经历，脑中一片茫然。

大家以为新北大公社只是要抄什么，等到里面没有动静了，我们几个人向 31 楼走近，打算回去。哪知一阵转头狂砸过来，打到地上，弹起来溅到身上，都是剧痛。我们惊慌失措，赶紧后退，左侧的 38 楼又飞来一阵砖头。我班只有一个蔡小海，一根筋，非要过去问个究竟。他一向与“井冈山”观点不合，反对派斗，自许公允，结果被新北大公社抓了过去，蒙上眼睛，捆上双臂，带到一个地方，棒打一番，连头部都挨了一拳，才放掉。他以后每描述那次经历，都气愤不已，从此转向铁杆反聂。

其实当时被打懵的，不只是我们这些净身出户，无家可归、无处可去的小兵卒子。更

找不着北的是“井冈山总部”的那些头头。据说他们在一起紧急开会几个小时争吵不休，拿不出个主意。是啊，哪见过这种阵势，谁承想会有如此狠手！本来，井冈山兵团就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散沙一盘，乌合之众，没有什么下级服从上级，全团服从总部之类的纪律。只有“反聂”两个字把大家连在一起，而程度、层次又各有不同，从胡纯和激进的“老井红”，到胡德平温和的“十一斗私批修学习班”。作为我们O派在总部的代表陈醒迈，素常被戏称为“陈老机”，寓意“老机会主义者”。

我们瑟瑟发抖，在黑暗中团团转了好长时间。焦急之中，总算传来总部指令，攻占32楼！我们赤手空拳蜂拥而去，像一伙暴徒，踹开门挨屋子找人。这个楼住的是中文系男生，“新北大公社”的人早已闻风而逃，整座楼立即被井冈山控制。化学系“03纵队”队长齐菊生指挥分配房间，我们0363的住四楼，几个人随便打开一个房间，就落脚了。

中午，由后勤部门青年工人组成的“海燕”战斗队占领了28楼，那里有“井冈山总部”和广播台，是“井冈山”这个群众组织的心脏。

这时天亮了，突然听到有人喊：看！老破鞋在楼下！“老破鞋”说的是聂元梓，其实她只是结过两次婚，而且都“不幸”，两次“被迫离婚”，自己并没有作风问题，井冈山的人是往她伤口撒盐。我从窗口一看，聂元梓正在被一大伙人围着，旁边还有一个军人，向西面31楼走去。气不打一出来，我们几个人飞快跑下楼，要去和她理论。

来到31楼南门外面，已经有了一个重重包围圈。我们在外面大骂聂破鞋发动武斗，场面乱成一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人从人群中挤出，向东南跑去，后面一阵喊声“抓住他！抓住他！有人刺聂元梓了！”我们没弄清怎么回事，本能地知道要保护这个人，挡住追赶的路。我们人多势众，他们只好看着那个人一溜烟消失了。

这就是有名的“刺杀聂元梓事件”。“凶手”是我们年级的樊能廷，“慨而慷”战斗队（我们叫它“老慷”）队长。大学毕业后到农村插队，我和他分到河北阜城县杨庙村，一条土炕上“同床”一年半。据当时传说他那天手里有一把红色木柄螺丝刀，挤进去举手比划了一下。没想捅出个大漏子，聂元梓头皮擦了一下，出了血。陪伴聂元梓“视察”的

那个军人，来视察武斗现场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据说手上也挂出了一道痕。

不过这老兄几年前著文，说他与“刺聂”案的聂元梓后脑勺皮伤无关，诬他“刺杀”乃乌龙。现在这个事件又成为北大文革史中一个迷雾。

公社广播台“抓凶手”的叫嚷，立刻不绝于耳，某地方贴出聂元梓后脑勺的大照片。什么头部重伤，鲜血淋淋，什么黑把匕首，早有预谋…。照片我看过，其实就是擦点皮，抹点红药水。不过李钟奇（当年批斗会上一拳把彭德怀打倒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脚，因此后来声名受损）这回竟没能英雄救美，让“凶手”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逃之夭夭，心中窝火自不必说，信誓旦旦，要把这个“手持黑把匕首”的家伙捉拿归案。

聂头皮被刮，受了惊吓，她不想高姿态，她要出这口气，口诛笔伐，我们也无可指责。可是当时的第一要务是制止武斗，如果她发一句话，“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撤出抢占到手的31楼，让井冈山的人归巢，北大的事态就不会发展，武斗就会平息。可是，她把“被刺事件”说成是武斗的起因，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把挑动武斗的罪责栽赃给“井冈山”，如此倒打一耙，蒙骗上层，也蒙骗本派群众，“井冈山”就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了。“校文革”发出“通缉令”，着意把事态搞大，转移视线。当晚，谢富治、温玉成来北大，要停止武斗，交出凶手，慰问老聂。此后，李钟奇又来北大，老调重弹，还是交凶手，警告不要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武斗必须在校文革领导下解决。

重压之下，以侯汉清为首的总部决定，铁了心，所谓“凶手”就是不交。那天双方交换俘虏，“新北大公社”从44楼黑牢扔出奄奄一息的樊立勤。樊立勤只是动口舌，语言上反聂，他膝盖骨钉得粉碎，手指骨被老虎钳夹断，手指甲钉竹签，完全是渣滓洞那里学的一套。这个樊能廷要是送上去，还不被生吞活撕了。井冈山总部发出两号动员令，一句话，政治迫害，不接受。

现在的人可能不会理解，当时“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可是重罪，要遭灭顶之灾的，不知总部这些人，在哪儿吃了豹子胆。

聂元梓在她的回忆中，竟然多次说北大武斗是“林彪指使谢富治搞的”，描述说“李

钟奇头上挨了一拳，打出一个包，匕首扎在我头顶上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都是血。对用匕首刺我的人，我从来没进行过追究……谢富治是他的后台。”一个当过多年干部的人，说话如此夸张，瞎话连篇，印在书上，只能让人更加看不起。

井冈山惹不起谢富治，却不在乎李钟奇，嘲笑他“李排长”（我百度了一下，查无根源），还管不了我们。其实他是唯一一个接见过“井冈山”头头，说过“井冈山”是“革命组织”的人。

四

回到32楼，我感觉自己像噩梦醒来，换了人间，眼前一切都那么陌生，那么不真实，那么让人惶恐。大家都在建筑工事，七手八脚，拆暖气，暖气片放在窗台上，准备公社进攻时往下砸。大锤子咣咣地砸墙，砖头哗哗地落下来，我们收集起来，堆到窗口，准备向“敌人”扔去。出现了一批能工巧匠，暖气管用来作扎枪。不知到哪里弄来的锯子、锉子、螺纹钢，洗脸房成了工作间、兵工厂，叮叮咚咚，人声嘈杂。暖气管截成一段段，装上了矛头，有的还有红穗穗。没有枪刺的，斜着一锉，出来个尖。长短不齐，人手一支。我也有了自己的扎枪，其实就是一根斜锯口的暖气管，连一层棉袄也扎不透。但它是我的好伙伴，陪着我度过了武斗岁月。没事就练练，甩着头转一圈，再往前一刺，“杀！”睡觉时也放在身边。从31楼被赶出来，我就失去了全部家当，现在扎枪代替了红宝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信仰、思想，没有了，不得不用以代替的，是崇尚暴力。

我们从小受教育，爱护公物、遵纪守法，行为要中规中矩，这些观念顷刻间抛到九霄云外。国家财产随便毁坏，砸、劈、扔、摔，一点儿也不心疼，一点也不犹疑。情绪不能控制，怒气、怨气借此发泄，造反派的脾气。我们几百人丢了全部家当，就用别人的，想拿什么拿什么，翻箱倒柜，比用自己的还顺手，不顺眼就扔，对这种报复心安理得。一夜之间，“乖乖孩”就变成了“恶汉”。不知谁发给我一件黄棉袄，旧的。当时这玩意很时兴，只要执行任务，我就穿着它，不管天气多热。它一直跟着我到农村插队，油哄哄的，

不曾洗过。我甚至穿着它去上海，拜见未来的丈母爹、丈母娘，让他们大惊失色，以为女儿搭上了小混混，差点坏了我的终身大事。

此时，一楼的房间完全撤空，窗子用木条钉牢，用卸下的门，木床顶死，用铁丝绑牢。楼上，该砸的砸，该拆的拆，碎石砖块就地取材，堆在窗口。这个时候，群龙无首，群众的情绪和行动最容易被少数人左右，只要有人一呼，就有人响应。自行车三轮车汽车内胎也搞来了，两头钉在窗框上，或者绑在床腿上，成了大弹弓。我小时候只玩过小弹弓，现在玩大的，放上碎砖头，比谁射得远，看谁射得准。有人甚至让别人抱住后腰，两个人拉弹弓。很长时间，这是武斗主要方式。当然，真正射中目标几率极低，只是起到震慑作用，楼与楼之间几乎没有行人了。有一次，我班同学吕成信拉弓时砖头打到窗框弹了回来，还好躲得及时，只擦到脸上，留了一个伤疤，好悬！我从此再也不碰大弹弓了。

双方都如此，无所不用其极，我感叹：是什么力量把我们一夜之间变成了这样？为什么“文弱书生”竟会变为破坏分子、暴民？难道就是简单的人性恶吗？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从小受到的“仇恨教育”——站稳阶级立场啊，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啊，对坏人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啊，长期的灌输，这些观念融化在了我们的血液中。当认准对方是“阶级敌人”的时候，就显出，或者力图显出狼性，再狠也不过分，有些人甚至越过了道德底线、失去人性，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

“3·29 武斗”事件，“井冈山”是无辜受害者，道义上占上风。但是暴力是胜者，很多“井冈山”的同学，觉得校园已经无立脚之地，开始了大逃亡。那几天如鸟兽散，海淀路，32路汽车，拥挤着逃难的人群，大包小包，肩挑背扛，自行车驮。投靠亲戚的，回老家的，寄宿在同学处的……。完全没有出路的，住到地质学院的大教室。现在中国有高铁，当年井冈山有“地铁”，地院东方红是铁哥们。那里是我们的大后方，几百个人住在那里，也可以帮助守楼的人做后勤供应。校内两派大分家，“井冈山”留校坚持守楼的只有几百人。

聂元梓的忘年交蒯大富，在他的回忆录《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中说：“清华武

斗之前，北大3月29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我们也想学这样做。”基于后一条“那一派就垮了”的错误信息，他决定效法北大，他认为中央首长都批过414，打起来对他有利，于是发动4·23武斗，想一举摧垮对立面。人大、民院等高校也燃起武斗烽烟，北大再次夺得“榜样”地位，掀开北京高校武斗大幕。

五

聂元梓把“井冈山”的人赶出31楼，是一次重大战术成功，随后的日子，双方在迅速进行整合，瓜分地盘，短时间没有新的面对面冲突。“井冈山”以将近北大师生半数的人数，只取得了28、30、32、35、36、37，这几座孤楼。而“新北大公社”迅速控制了周围16~44所有楼房，形成包围圈。“公社”又把守了五个校门，把持了所有食堂，不许另一派去吃饭，北大成为“公社”之天下，“井冈山”的劣势已成为定局。

有了这几座楼，井冈山必须占领35和37之间的36楼，才能连成岛链。经过各楼守楼战士多次呼吁，总部决定拿下这个孤岛。时间4月25日，化学系“03纵队”充当“进驻部队”。

36楼原来由几个系女生混住，包括化学系女生。3·29事件以后，“新北大公社”的女生，按照她们组织的部署，陆续迁出这座楼。到4月25日，楼里只剩下二三十名“井冈山”的女生。我们上了几年大学，从来没进来过。这一次，一群脏了巴几、破衣烂衫的大老爷们不请自到，而且是狂呼乱叫，冲进来的。没有任何抵抗，如入无人之境。女同学的闺房，有一种神秘感，那里的女生早已经跑光了，也算是“没有硝烟的战斗”。我推开门检查，飘来淡淡的清香，看到别有情调的布置，果真跟我们这些“乱室英雄”的狗窝大不一样。我们七手八脚，拆暖气，砸床铺，找砖头，建筑工事，准备迎战。

聂元梓手下那么多能人，对于36楼竟然没有先下手为强，锁住井冈山的命门，无疑是个重大失误。4·26他们才来马后炮，力图夺取要津，于是一场恶战临头。

我从四楼窗外望去，黄压压的一片片，从34楼、38楼两个方向涌过来。戴头盔，身穿黄皮，手持扎枪，整齐划一，推进有序，喊声震天。前排的，举着床板掩护，要从窗户和门强攻进入，有人甚至架了梯子硬攻二楼。那场面，雄壮而恐怖，过去只有在电影的古代战争里看到。据说，孙蓬一亲自督战，势在必夺。

我感到热血涌头，却毫无恐惧之感。早已红了眼，只有一个念头，打退他们！鱼死网破，背水一战，只在今朝。砖头像雨点一样投去，大暖气片从窗台推下，咣当一声，我伸头一看，没砸着。

这暖气片巨型重物只是吓吓人的，上方轰然掉下庞然大物会使攻楼者魂飞魄散。不过现在想想也后脊梁发凉。万一失手落到谁的头顶上，自己的后半生将永无宁日，在梦魇中度过！

一楼顶不住公社的强攻，一时失守，对方强攻部队砸开西墙，冲进一个房间，破墙打洞向前推进。万般危急之中，我们年级的骆如铁情急智生，用大锤在二楼地板打了大洞，我们的人在上面用枪扎，用砖头砸，用水泼，终于把入侵者赶出楼外，36楼胜利守住！这是北大武斗中最惨烈的一场，受伤者据说上百，基本是公社的。这对井冈山，是生死之战。广播台立即报道大好喜讯，“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我们欢欣鼓舞，士气大振。

我猜想事后聂元梓、孙蓬一一定肠子都悔青了，没有早下手把36楼拿下。否则北大文革的历史会完全改写，28楼成为瓮中之鳖，“井冈山”头头们束手就擒，这个组织彻底摧毁……我常常陷入宿命论：难道真的在冥冥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保佑着井冈山？天不灭我啊。

井冈山总部不是省油的灯，固守36楼的4·26大捷冲昏了头脑，突发臆想，轻举妄动，竟然要主动招惹新北大公社！5月2日，派我们“03纵队”几十人，去38楼出击，抢什么木板床。楼里那么多床，竟然当成了稀缺货！

这种无厘头瞎指挥的事，我很恼火。当然，更重要的，是我根本不想上战场玩命！唉，

派性高于一切，不理解也得执行，上了贼船不由己。临危受命，战前，纵队长齐菊生作动员，说，我们20岁的小伙子，除了没娶媳妇，什么没见过？这回要拼死一战，活出个样子！一针鸡血，群情激昂，杀声一片。我们几十个人，冲出37楼，手持七长八短的扎抢，缓步推进。远处，“新北大公社”的武斗队已经严阵以待。这样的面对面交锋，我很是恐惧，短短几秒，脑子里翻腾出无数想法，可能会受伤，被活捉，甚至死掉…但是咬着牙，决不能当怂蛋。

我们的装束，五花八门，五颜六色，戴柳条帽的，狗皮帽的，自制帽的，各人有各人的高招，简直就是一群“丐帮”。出发前，有人给了我一个几块铁皮串起来的“护胸甲”，套在脖子上，人一挪动，铁片铮铮作响。而对面的，俨然“正规队伍”——矿工头盔，铁网面罩，铁皮盔甲，武装上、气势上压我们一头。我俩眼睛盯前方，小步前移，突然右侧的腰一阵酸疼，一看从侧面杀出一支“公社”队伍，我看到的只是一张张模糊的脸，找不到是哪位老兄刺着我了。被夹击了！在撤退的指令下，我们还没有和对方交上火，就溃不成军，逃了回来，这一次损失惨重，许多人受伤。

我不敢去校医院，就回了老家天津。做个检查，那块地方肉厚，无大碍，没伤内脏，只是扎一个洞，留个疤，也算是文革的纪念。酸疼不止，情绪不佳。刚呆几天，传来通知，“新北大公社”正在到处抓人，家不是安乐窝。不得消停，还是回到战友中安全。

到此为止，双方各有捷报，又各有昏招，毕竟是书生，强拉上战场啊。

4·26之后，北大武斗“割据”格局基本形成。

新北大公社完成了包围圈，是攻势，不断挤压井冈山的生存空间，不给活路。井冈山则元气大伤，武斗前用“批判的武器”对聂元梓主动出击挑战的气势完全没了，在“新北大公社”强大的“武器的批判”下，只能以偏安一隅，保命为主，一切为了生存。

“井冈山”一方要生存，“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一方不许“井冈山”生存，成为北大武斗主线。

如果那一年五月也有校庆的话，该是整整70年了，也是大庆。可是当下一个两年都

没有开课的学校，校园成了战场，学生成了暴民，建筑物到处伤痕累累，千疮百孔，瓦砾遍地，流弹横飞，谁还记得有个校庆！“新北大公社”的人正在为收紧包围圈、“剿灭井冈山”而绞尽脑汁，“井冈山”的人则在为固若金汤而众志成城。

虽然六座楼连成了一串，“井冈山”有了与聶元梓“校文革”分庭抗礼的一隅地盘，楼与楼之间的来往却十分危险——“新北大公社”在周围楼群里布满了大弹弓，砖头不断从各个方向射来，没有死角，偌大的楼间空地布满了残砖碎瓦。“公社”武斗小分队还不时出来袭扰。

井冈山楼与楼进口之间竖起两排木床，上面再盖上木床，形成封闭的通道。来往通行，虽然不断听到砖头打在床板上的声音，安全无虞，我自廊中信步。

为了双保险，36和32楼之间，28和32楼之间，挖了地道，由地质地理系同学勘察设计，住在两楼里同学用最原始的方法一锹一锹地挖土，抽屉、脸盆运土，三班倒挖成的。两头动工，中间会面，三米深，一人高，可并行交错，安有电灯，地湿漉漉，墙湿漉漉。其他楼之间也有地道相连，32到35，35到36。挖出的土存在一楼宿舍，公社的人神不知鬼不觉。由于没有坑木支撑，武斗停止后不久，一场暴雨，地道塌掉了。

“井冈山总部”所在的28楼，处在“割据区”最北端，为了和西边相距15米的30楼之间来往方便，决定在四楼架设天桥。从36楼拆下屋顶的松木人字梁做基本材料，在走廊里预制好二十米的桥身。打掉了28楼30楼相对的四楼楼道窗户和窗台，用床板做好桥的面板。

一桥飞架东西，井冈山的人欢天喜地，都去过过瘾，平稳若坦途，同时通行三到四人，比如今张家界玻璃桥刺激，还有人合影留念，这里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自行设计，土法上马，群策群力。由技术物理系组成七八个人的土工程师团队，64级的况明星是总设计师，使出浑身解术，很有点高科技。施工时井冈山倾巢出动，五十多人在现场安装。32到35楼之间的桥则简单，只是个铁索桥，铺点木板，晃晃悠悠，要走得有当年大渡河十八勇士的胆量。当时的北京，还没时兴楼间天桥，北大“井冈山”做出了“创举”。

六座楼中，只有 37 楼靠马路，在院墙打出个豁口，木床搭成通道，一直伸向海淀路马路边，是与外界联系的唯一出口。斜对面是 32 路汽车站，它的后面有一条南北胡同“军机处”，里面东西向的胡同叫“老虎洞”，走进去是市场、商店，可以买生活用品。那时很多男生抽烟，隔几天就得去一次。0363 坚守的二十来个男生，调防住到 37 楼，任务就是三班倒，守卫这个出口，迎来送往，保护我们的人安全进入“老虎洞”或上汽车，迎接返回的战友。

在通道里值夜班的情形，现在还恍如昨日，历历在目。外面万籁俱寂，远处灯光稀疏，里面黑咕龙咚。很多战争片里，士兵们在大战间歇，漆黑的夜晚，在战壕里畅想未来，交谈胜利后的打算，有滋有味。我们经常三四个人站岗，当时谈的内容，不记得了。肯定不是未来的事，没人知道文革何时结束、怎样结束、将来能干什么。大概是些过去事情的甜蜜回忆吧，不过任何甜蜜的事情，那时也没味道了。或者就是各想心事，自嚙苦酒。

“新北大公社”经常往这条马路投掷砖头、打弹弓，也曾砸坏公交车，那个车站不得已搬了家。车站后面有个饭馆，叫“长征食堂”，物美价廉，好吃不贵，几乎每个北大学生都光顾过，我们亲切称之“学七食堂”（北大有六个学生食堂）。在“新北大公社”大弹弓的狂轰滥炸下，它也停业打烊了。

我们这个出口处于南校门和西南校门之间，“公社”的人经常从两个方向来骚扰。一般离得远远的，两边叫骂，互扔砖头，并无当面比试。有过几次，他们哗啦啦来一大片，我们躲进通道，只看见扎枪沿着床铺之间的缝隙往里乱捅，因为空间很大，有 5 米之宽，伤不着我们。我们也从里面向外乱捅，作为回敬。和我排在一班的李人杰，经常事后手舞足蹈，“我扎着了一个！亲眼看到的！”他因前额头发有一撮白，被叫“小白毛”，广东人，年纪小，个子又最矮。我们都知道他是瞎说，连地方毛皮也碰不到，不过当时真的是把扎伤对方的人当作一件光彩的事呢。

武斗期间，“新北大公社”打死三个无辜的人。先是 19 岁的地院附中高三学生温家驹，4 月 19 日在图书馆看书，被抓到生物楼低温实验室，审讯打死。4 月 27 日，地球物

理系 62 级学生殷文杰路过 44 楼，被公社一伙人围住，乱枪刺去，刺穿了股动脉，死时年仅 20 岁。7 月 20 日，地质地理系 61 级学生刘玮回校办毕业手续，在海淀街上被抓，关到 40 楼，乱棒打死，24 岁。他们没有一个死于战场，都是赤手空拳被抓捕，活活打死的，惨无人道。

自从有人去学校食堂吃饭被抓、被打，那个地方不能去了。一开始我们去海淀买点东西，用电炉各自解决，煮稀饭、下面条是最经常的。后来各系各年级成立集体小灶，就在宿舍里，支起大锅，劈了桌子、椅子烧火。葱姜油酱，米面蔬菜，一应俱全，烟雾缭绕，香味扑鼻。我们年级坚守的几个女生，王文芝、张俭、游君玲、王起云、陈珍德，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担当煮妇厨娘大任，为将来当贤内助提前实习。男生则是“君子远庖厨”，吃现成的。偶尔帮助买买菜，也可能被抓。校外地派单位，用车拉来粮食蔬菜，集中送，支援这个重灾区。我们这几百号人，实行着毛一直推崇的供给制，大锅饭，官兵一致，平等相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也其乐融融。白色恐怖中的红区，“井冈山”的天是明朗的天。

6 月 24 日，北京运输三场给困守在楼中的井冈山送菜，“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从东西两面包抄。在我方 37 楼前，双方发生武斗。“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砸坏了汽车，打伤了司机。此后我们也不敢擅自离开学校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六

武斗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或者说完全失去了正常的生活。我们被卡在极小的活动空间，只能进行有限的活动，成了有自由的囚徒，晒晒太阳，呼吸一下校外的清新空气都是奢望。除了值班，就呆在宿舍里，偶尔翻翻书，也看不下去。要寻求刺激，自我麻醉，更多的时间是打麻将、打牌、下棋。我中学就玩麻将，教别人，天天打得昏天黑地，脑袋麻木。“睡觉睡到自然醒，打牌打到手抽筋”，这辈子再也没有这么放纵颓废的生活。围棋象棋，有人下有人看。围棋都是初学，有人进步飞快，吕成信、徐秉玖，就下得好，杨

惟立后来还拿到业余段位。赵凯元则是“悔棋大王”，不许他悔棋就跟你拍桌子瞪眼。抽烟，整天腾云吐雾。买来一盒，到处一撒，基本就没了，再抽别人的。

聂元梓“校文革”的思路越来越明确，必欲置“井冈山”于死地，不让其喘息。软硬两手，文攻武吓，组织上瓦解，思想上摧毁。

为加大围攻力度，“新北大公社”成立了黄树田为首的东线指挥部和技术物理系63级宫香政为首的西线指挥部，准备制土枪、土炮、土手榴弹，派人外出搞枪支。7月，孙蓬一到化学楼101召集会议，要求化学系“公社战士”为武斗做出特殊贡献。

另一方面，扣工资，扣助学金，抓人刑讯，心理战术，“挖山不止”。这个时候，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没有了，只剩下大喇叭。公社广播台连篇累牍，毫不掩饰地高喊“秋后算帐”，将来会无情打击。对抗聂元梓的人，将来都不会有好下场。甚至“工作做到家庭里”，用公函名义给家长去信，施加压力。“井冈山”的两员大将徐运朴、牛太忠被抓，一定是上了不少手段，老徐腿被打断，扛不住了，声明退出，叫“下山”。我们班也有人“下山”，据聂元梓向毛报功时说，下山人数已达一千人。谁要是“弃暗投明”了，还是不得安宁，要发表“下山声明”，参加“学习班”，反省忏悔，给其他井冈山人做榜样。在这点上，老聂玩政治玩到了家，花样翻新，“井冈山”一群涉世不深的学生根本不是对手。

武斗期间，我们班“井冈山”一派的黄关锦在上海卷入一个“反革命集团案”被抓，移交给“新北大公社”审讯。黄在关押期间，寻机逃脱，投奔到“井冈山”割据的楼。“井冈山”决定对其收留，隔离，放置。我是他的战斗队长，他长期在上海，我又写过几封信，通报北大运动情况，决定私下见他。他告诉我“公社”的人对他动了刑，逼他交代我和吕成信的材料，他不得已也做了捏造。我表面若无其事，心中如翻江倒海，确定自己是在“新北大公社”必整之列，惶惶不安，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在楼里，“井冈山”的同学表面都很振奋，必胜的信心十足。可是我的内心，却很悲观，觉得“井冈山”气数已尽，只是在苟延残喘，最终要被“新北大公社”一窝端。到那

一天，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迎接我的将是灭顶之灾。

曾几何时，我们这些人意气风发，以为天下就是我们的天下，我们就是中国的主人，跟着毛，横扫千军，打倒一切。一个武斗，一切虚幻都打碎了。现在成了笼内困兽，瓮中之鳖。失望，怀疑，迷茫，痛苦，万念俱灰，不过这些想法和感觉只能在脑中一闪念，绝不能深思，绝不能发展！太反动，太可怕了。当然，更不能和别人交流，那害人害己。恐怖笼罩着。

有人以为文革是大民主，思想自由，殊不知那种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滋味，人人自危，是多么恐怖！

在“割据区”的楼里，我们虽然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可是大家不谈政治，不谈运动，不谈文革的前景。北大向何处去，谁也不知道，上面的表态，根本不要指望，外面的形势，知道的也很少，零星有些传闻，也不够鸡血，提不起精神。

五月份，“新北大公社”把技术物理系学生邓朴方、邓楠兄妹绑架，关了三个月，逼他们交待邓小平的“罪行”，想给“井冈山”安上一个“黑后台”。邓朴方被逼无奈，跳楼，摔成高位截瘫，终身残疾。这件事是聂元梓的致命失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她再说邓跳楼时已不在位也没用，抓、关、打、审，都和她有关。聂元梓一辈子在识别政治风向上很下功夫，到底还是“有眼不识泰山”，栽了跟头。

七

作为武斗中的小花絮，双方在斗智上也各显神通。

“井冈山”的一个杰作就是“监听电话”。当时，全校电话系统完全由“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控制，“井冈山”在孤楼里打不成电话，监听一下总可以吧。此时尼克松“水门事件”监听电话的事还没发生（发生了中国老百姓也不知道），不懂得这里法律责任的厉害。有原在学校广播台工作过的井冈山人，熟悉地下线路铺设，指出在28楼和30楼之间某处的地下，有一个电缆接口。于是开挖，两个化学系62级的壮汉，每天吃饱了

饭玩神秘失踪，像土拨鼠钻地一样去打洞刨土。找到电话接口，连到我们接收器上，两个人日夜监听记录，神不知鬼不觉。“公社”的调兵遣将，电话就报了信。有一次偷袭，他们人刚摸到阵地，“井冈山”早等候着呢，唰的一下，探照灯齐照，再一阵砖头，偷袭者无处藏身，抱头鼠窜。

不过，更是人惊心动魄的，是“新北大公社”巧施“反间计”，让井冈山上层有一次大震荡。——有一天传出爆炸新闻，动态组组长化学系62级的黄××是个内奸，潜伏已久，被撕开了画皮”。黄英俊威武，为人谦和，说话慢条斯理，为井冈山立了汗马功劳，大家常在一起聊天，很有见地，我对他很是尊重，谁想竟是“内鬼”，人心隔肚皮如此，这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他被隔离在一个房间，据说开个小口有人送饭，不准出来放风，不许与任何人接触，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更有甚者，竟有人情绪不好时，闯进去“教训”他一通。

武斗结束大联合时，我才看见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面色雪白，目光呆滞。“井冈山”的人不理他，“公社”的人也不理他，都拿他当挑动武斗的坏人批。直到“公社”的人自我反省，才爆出背后的惊天秘密。我听到的版本是这样的：公社抓了“井冈山”一个人，把眼蒙起来审讯，故意让他模模糊糊看见一点，安排一个长得极像黄××的人晃了几下。这位老兄释放后就上报总部，看见黄××在审讯现场。“井冈山”已是惊弓之鸟，鲁莽行事，犯低级错误，中了奸计，隔离了黄××，大水冲了龙王庙。这事，是我觉得武斗期间最匪夷所思的一件。或许还有其他内情，但不可否认是一场冤案，“井冈山”莫大的丑闻。几十年后，当年的总部头头侯汉清当面向黄××诚挚道歉。

黄××的事使得武斗绝境中“井冈山”人心惶惶，甚至有流言怀疑另一位头头也可能是奸细。

八

聂元梓围困个井冈山几个月了，久攻不下。“井冈山”风雨飘摇，却还在硬撑着。风

传对方要用狠招，断水断电。小试了几次，酝酿着来彻底的断水断电。井冈山得到风声，就有人设计储水池来应对。在36楼弄空了一间宿舍，门窗用砖垒死，四面抹好水泥，只留一个小口，往屋里灌水储存。我还去参观，水管子正在突突送水。有人算过长乘宽乘高这一屋子水够多少人用多少天。没想到，灌到半截，北侧的砖墙就爆裂了水哗哗地向外流。那位设计者，没有计算到砖墙能承受的水压。我亲眼看见好几个小子破开墙，跳进去扑腾洗澡，痛快一番，眼看着水漏光了。

电是更大的问题，懂行的同学作了调查，可以接海淀路上的高压线。一万一千伏高压，带电操作，本身就是高技术含量，高风险，还要在夜间进行，土法上马。更要命的，是“新北大公社”一定会倾尽全力，前来阻止破坏，操作人员的死活他们才不管呐。

“井冈山”事先多次讨论，群策群力，制定方案，具体到每一个细节。关键操作交给技术物理系17纵队，我们03纵负责保卫。记得讨论时，有人建议马路撒绿豆，打滑，公社进攻的人跑不动，看起来是突发奇想，有点像闹着玩，总部采纳了。当年国军中将陈明仁守四平时，就干了一件“撒豆成兵”，把车站大袋大袋的黄豆运到通往天桥的路上，等民主联军准备突破天桥时，突然迅速撕破麻袋，滚圆的黄豆散满桥面，民主联军前仰后翻，行动失败。我们那个灵感，不知是不是由此而来。

7月22日晚，行动开始。我被派守在楼里执勤，没有亲到现场，那精彩时刻都是后来别人给我讲述的。

晚上整十点行动开始，不像现在，还有个什么行动代号。全副武装的“井冈山”守楼学生首先推着一张张木床，冲出37楼那个出口，摆成两排，把马路东西两头封住，简直像演大戏！担任接电的技术物理系三勇士，肖正贵、顾仁虎和关玉霖，迅速出场登上梯子，分处三层位置，依次把一根带有环形夹子的绝缘杆往上传，肖在最上。他把绝缘棒上探，让环形夹勾住一根电线，然后旋转手中的棒，把夹子固定紧，一个线头就接好了。三相电，接了三个头，大功告成！

也许这不过是个常规的电工操作，令人炫目的，是它发生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工作条件

下。

“公社”武斗队早就知道消息，呼啦啦从东西两方向包围，密密麻麻，展开一场恶战。我们的人掌握着制空权，从楼上投掷砖头、打弹弓，来犯者太多了，几乎弹无虚发。他们快接近木床街垒时，又陷入“绿豆阵”，脚下打滑，人仰马翻，智守克强攻，奏效了！

“新北大公社”还使用了自制了燃烧弹，火光四射。其实很简单，一个瓶子里装白磷，一个瓶子里装酒精或乙醚，扔出后，瓶子摔破，白磷自燃，点着了酒精乙醚。

突然间，电来了，灯亮了，成功了！六座楼盘一片辉煌，欢呼声响彻云霄，大喇叭传来“井冈山”广播台播音员激动自豪的声音：“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那么沁人肺腑。

这是北大武斗最高潮的一幕，也是“井冈山”得意的神来之笔。公社社长卢平亲临指挥，挨了一砖头，这回不是“黑把匕首”擦点皮，真的流血了，“光荣”地上医院了。

九

“7·23 接电”行动给井冈山带来的，不仅是新的士气，更意想不到的是竟然时来运转。就在随后几天，局势急转直下，北京市革委发文不许武斗，工人组织游行宣传制止武斗，工宣队强行进驻清华平息武斗，最后，雷霆震怒的毛老人 7 月 28 日凌晨紧急召见五大领袖，严令停止武斗。一件件事态的新发展，像春风，吹到我们心里。

风云突变，高校全停战。校文革发表了无条件停止武斗的通告。屈指一算，双方交火 120 天。我们终于从重围中走了出来，重见天日，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可以到未名湖享受湖光塔影，可以到海淀巷子里的小饭馆胡吃海塞。要是现在，心理医生，“心理辅导”该来了，那时谁听过这玩意。四个月的扭曲日子有没有带来心理创伤？看来我们有钢筋铁骨，很快适应了，投入了新的生活。

没有清华对于工宣队那样的武装抵抗，北大和平解放。结束武装割据，拆除武斗工事，清理武斗现场，上交武斗工具。8 月 20 日，新北大公社上交武器，计有长矛扎枪 930 支，

安全帽 518 顶，护身甲 336 副，铁棍 200 根。8 月 21 日，井冈山交出武器，长矛 749 支，铁棍 71 根，护身甲 208 副，柳条帽 432 顶，弹弓 8 个，小口径子弹 37 发。

我们回到了阔别四个多月的 31 楼，逃离在外的同学也返校团圆。8 月 28 日 22 点，新北大学公社解散。29 日下午 3 点，井冈山解散。屈指算来，山上只呆一年，觉得阅尽人间事，大起大落，沧海桑田。

北京 59 所高校陆续都派进工宣队、军宣队。还是两年前遭到批判的刘少奇工作组那一套，只不过不是小分队了，而是人海战术；不是素质良好的领导干部了，而是毫无训练匆忙上阵的工人，以及不宜过多介入政治的军人；不是呆两个月，而是一住好几年。绕了一大圈，原地退步。工军宣队进驻北大是在 8 月 19 日。一机床、二机床、外文印刷厂、齿轮厂、财经印刷厂、63 军（4587 部队），6 个单位共 492 人。这是北大文革第四个节点，从此学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北大命运不再由北大人自己掌握。

工军宣队进驻北大，两派学生的派性远远没消除。有一次，我随井冈山七十几人，步行游周口店云水洞妙峰山，路上和新北大公社三十多人小分队不期而遇，我们仗着人多势众，挑头生事，对方也不是软柿子，辩论几句双方就开打，他们自然是落荒而逃，我这个小没打过架的规矩学生从心里也产生了莫名的兴奋和激动。

【化学系 62 级赵承易补正：读完李瑾笔记，有一点更正——这次活动我们年级也有男女生好几个人参加，不是在 3·29 之前，而是在 7·28 之后八月份的一天。守了几个月楼，都想出去散散心，确实有七十多人参加。从永定门乘火车去房山。先去“北京猿人”洞，然后步行二三十公里去云水洞，下榻在北大地质地理系的“房山实习基地”。随身携带简易卧具。第一天在餐厅吃饭，碰见三十多公社的人员，我们中有年轻气盛的“海燕战斗队”小伙子，话不投机，与对方就在餐厅干起来。大多数人没有参与，反正“公社”的人吃亏了。该基地当时是某部队占为营房。第二天早饭后出发去云水洞，回来天已经完全黑了。不想部队不准我们进入，出来一个当官的，口口声声说：我们是支持聂元梓的（显然他们知道餐厅打斗之事），赵凯元带我们念语录“下定决心 不怕…”准备列队往里冲，

此时基地里忽传出集合号。为避免冲突，我们就停下来。经交涉，把大家（寄宿用的）行李扔出来，在房山车站站台整整蹲了一夜。第三天凌晨返回。此事说明是在7·23之后。还有一个铁证：老耿带了两瓶7·23公社投掷而没有炸响的燃烧弹，在云水洞里扯下一只袖子，打碎瓶子，点燃做火把，出来后，男男女女都熏黑了脸。在此做一点说明：3·29、4·26、6·24、7·22及7·23，没有一次行动是井冈山主动去打，都是被迫在家防守。只是5·2却确实头脑发热，伤了多人。■

【述往】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十四）

——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陆伟国

这里插一段话：我为什么会想起日本共产党？我是个共产党员。《国际歌》是我的最爱。你听那雄壮的歌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那个思想境界，跟“他是人民大救星”完全不是一回事。在小说《革命四十年》中，我提到了几十首歌曲，《国际歌》是唯一提到了三次的一首歌。2011年，是《国际歌》诞生140周年。意味深长的是，在有些人号召大唱红歌的今天，却没有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战歌的应有的地位。（在我写这段话的时候，是2011年，那个薄熙来还在台上。）

我十分关注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风云变幻。从阿连德、格瓦拉到奥尔特加，从门格图斯、多斯桑托斯到卢蒙巴，从艾地、宫本显治、德钦巴登顶到卡尔迈勒，他们都时时浮现在我脑海（怎么评价他们是另回事）。举个例子，2003年，美军刚进占伊拉克，在巴格达市民推倒广场上萨达姆塑像的电视画面里，我就注意到有人举起了红旗。在萨达姆统治时期，伊拉克共产党几乎被斩尽杀绝，处境十分艰难。现在有些人只讲美国攻打伊

拉克，却只字不提萨达姆怎么杀共产党的。看到这面红旗，我十分惊喜。果然，几天后，有外电报道，伊拉克共产党人在第一时间就站出来重新活动。伊拉克第一次议会选举，他们还获得了两个席位，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为他们感到欣慰和敬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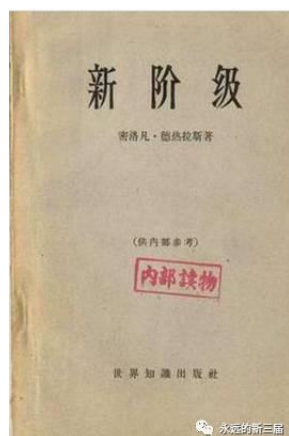
战后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在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左派运动，曾有过一个上升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越南南北统一和苏联出兵阿富汗为标志达到了顶点。之所以在八十年代末之后出现了人所共知的崩塌，其主要原因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都已经严重不适应社会发展而难以为继，或者说，从一开始就不适应社会发展；所实行的内外政策频频失误；对内的专制体制，形成了腐败的不可救药的特权阶层，而特权阶层又支撑起专制体制；由此，执政党脱离人民群众，进而失去了民心，失去了自我更新的动力，失去了引领社会向前发展的能力；多少革命志士为之向往和奋斗的社会主义出现了异化。而社会则要冲破旧有体制的束缚，寻找新的出路，继续向前发展，这就不足为怪了。如果简单明了地用一句话讲，那就是高放教授说的：“苏联这个国家垮台，最根本的原因是缺少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不能让群众集思广益，推动国家的进步。”（请见：《南方周末》，2011年6月30日）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却讲得更直接。早在1999年底，他在新千年文告中就说：过去百年来的共产主义尝试，已经失败！普京还沉痛地说：“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罗斯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为共产主义原理而奋斗的标志下生活的。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否定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意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了那种巨大的代价，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主要的错误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这正是需要全世界共产党人深思，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正确道路？怎样正确全面地认识、理解、发展马克

思主义？一百多年来，无数的共产党人为了这个革命理想作出了许多艰苦卓绝的奋斗，甚至抛头颅洒热血。然而，在许多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中，既有很多正确的，也有很多是错误的东西。有的甚至是极其惨痛的、令人侧目的教训。

在今天，我们很少研究共产主义、甚至很少提到共产主义这个词了。共产主义事业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不知是近了还是远了；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是更清晰了，还是更模糊了？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有着重大的含义。可能有的问题是，越往前行，水越来越深了，我们摸到了前面的石头吗？面对深水，我们学会了游泳吗？就一直停在浅水里，看那模糊的对岸吗？更何况，即使是站在原地的浅处，春天的水位还会持续上涨，脚下的泥沙不断被冲刷，我们还能站多久呢？令人担心的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尽管嘴巴上讲的还是共产主义、举的还是这面旗（不过已经很少很少讲了），可他们心里想的、实际做的，究竟还有多少是在奔向共产主义的意思呢？有的人恐怕是已经摸到了鱼，不想再摸石头了，摸到也扔了，更不想去到对岸了，只想着水再混点、再多摸到几条鱼才好呢。再一次地问，共产主义离我们是近了还是更远了？是清晰了还是更模糊了？



这里介绍一下南斯拉夫政治家吉拉斯 1957 年在狱中的力作《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1963 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内部出版）。这本书中，他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他们就是苏联党内的政治官僚集团，是苏联的统治阶级，是由一群因垄断大权而享有种种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人们构成。吉拉斯说，这个新阶级的特征是：1、从起源上看，在革命之前，他们并不拥有权力。2、有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3、随着新阶级地位的稳固，新阶级越来越强。4、不是所有的党员都能够成为新阶级，新阶级的核心是党的官员 5、就新阶级成员更替来说，新阶级成员流动的开放性是很限，越往上则越窄。不过从庇护型流动的角度来说，新阶级的家庭背景对于子女社会流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6、新阶级的本质是统治阶级、剥削阶级。

马克思预言无产阶级在执政之后，社会将趋向于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即一个消除了社会不平等的社会。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却与马克思的预料不同，甚至恰恰相反。因为新阶级具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新阶级和工人在薪金、福利方面有天壤之别。吉拉斯说，马克思说在私有制社里会有了财产所有权就有了权力，而新阶级则是有了权力就有了财产所有权。这些话，拿到我们这儿，还需要更多的解释吗？那些贪官和特权阶层，不就是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吗？

现在有句常讲的话，叫“不忘初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初心就是要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笔者认为，共产主义理想最主要的要点就是：实现一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这是《共产党宣言》原话告诉我们的，也是我们共产党人为了之努力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最高目标和根本特征。再讲简单明了一点，共产主义就是在全世界所有人都能自由全面地发展，这也是和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相一致的。如果没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就不可能有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不但要学会游泳，还要架起桥梁向着理想社会一步步地迈进。千百万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也正是为了这个理想。任何忘记、偏离、抛弃这一点的做法，都是对革命理想的动摇和背叛。看看今天既得利益集团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他们离这一点有多远吧。

说到这儿，笔者想在此更多地讲一下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我赞同于光远先生的这段话，他说：“相信共产主义是我的偏好。但是，不要把偏好变成偏见，不要把你偏好之外的其他理论思想观念，都完全否定，看作是你死我活、不可对话的。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偏好变成偏信，要抱着多元的学习借鉴态度前瞻的、开拓的、与时俱进的、永不放弃追求真理的精神。”（请见“一个不弃理想的社会主义者”，丁学良，“南方周末”，2013.11.7）

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未来可供选择的发展方向之一，但不一定都非得那样。人类社会的未来会更加多元化，更加丰富多彩。共产主义者可以认为共产主义是美好的社会，是他们追求的理想。但不必要也不可能非逼着所有的人都得那样想。

同时，共产主义也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它在未来同一时期可以有不同模式，在未来

不同时期更会有不同的阶段和模式。人类社会永远是在不断发展的，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继续向前发展，不存在某个终极模式。如果有人告诉你，人类社会会有个终极模式，哪怕他说的是多么的美妙无比、天花乱坠。请你心里有数，那就一定不是科学而是宗教，比如极乐世界。同样的，共产主义也不是终极模式。

近百年来，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令人感叹。有多少仁人志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为之而奋斗。但是也勿用讳言，另有些人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却完全背离了共产主义的原则和初衷，犯下了很多错误甚至罪行。比如斯大林，比如波尔布特，等等。以至于共产主义被很多人病诟，在世界上跌入了低潮。

所以出现这些情况，除了那些人的所作所为之外，应该说，也和共产主义理论本身不成熟、不完整有关。

共产主义理论起源于社会主义思想。而社会主义包含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种种向往和种种解释，一部分更加革命和激进的人，便提出了更加超前而又不够完善的共产主义设想。在社会主义已经建设了几十年之后，小平同志还提出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说连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还没有完全解决。更何况是共产主义理论呢。

对于共产主义怎么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此没说多少。在马克思的早期，只强调了暴力革命，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夺取了以后怎么办，很少涉及。至于夺取政权以后的社会治理模式、经济发展模式，马克思更没说多少。晚年的恩格斯在观念上有所调整，限于篇幅，这儿不展开了。列宁甚至说过：我们不知道这些转变怎么进行。

应该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生活倒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至今不很清楚。在1958年大跃进的狂热中，一天等于二十年，真以为就要一步跨进共产主义了。那时，还真的很认真地讨论过共产主义的社会模式。但是该讨论的没讨论，在经典著作中明确讲到的是，到了共产主义，国家将消亡，阶级将消亡，政府将消亡，政党将消亡，把这些避开，而是去讨论自己想讨论的问题，结果很快就没法进行下去了。因为那成了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瞎扯。

比如，当时讨论过“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还会有家庭吗？”。因为有种观点认为，到了共产主义，不但国家的职能消亡，连家庭的职能也会消亡。还真有人想入非非，天真地问：没有家庭了，那下了班晚上去哪儿呢，找谁去呢？这还真没法再往下想。这个议题的讨论，后来因为全国妇联的反对，很快被终止。

另外，当时对共产主义的表述是，到那时有两个极大：人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物质财富极大丰富。

第一个极大，具体的话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后来高层一想，不对，怎么翻来复去突出一个“我”字呢？毛泽东说：“这个话以后就不要提了。有人说，这是马克思说的。马克思说的，也可以不提么。”后来就改成了“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据说是陈伯达改的。没多长时间，这话也不说了。因为讲来讲去，还是一人，一点也没有集体主义的意思。

第二个极大，表述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又一想，也不对，各取所需，那还有完吗，不就乱套了吗？人的欲望是不可能完全满足的。于是又改了，说是原先翻译得不好，改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这就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不上了。共产主义是没有政府组织的，是自由人联合体。而“按需分配”就得有行政机构在那儿。其实，这种“按需分配”，1956年中国就实现了。粮食定量就是这个办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粮食购买限额。小孩从几斤到十几斤不等，居民26斤，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又根据体力支出多少的不等而有高低不同的粮食定量。这种“按需分配”还用等到共产主义吗？这样的画饼充饥式的描绘，也就没有号召力了。

况且对社会主义的描述已经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两者强调的共同点都是要“各尽所能”，就是都要你使劲干活，竭尽所能地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就在“按需分配”和“按劳分配”，那还用得着为这去奋斗几百年吗？

至于，实现共产主义到底要多少年，更是说不清了。1958年曾经说过，“苦战三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正如老百姓所说的：“苦战三年，越战越苦”，迅速进入了

大饥荒。后来，又有了几种不同的说法。有说，五十年或两个五十年。又后来，说，一百年或更多一点。再后来，说，一百年到几百年。就没好意思说，得一千年，那样不就成了仙了。我这儿也不说，这些话是谁说的了。共产主义的不成熟，实际上更是共产主义队伍的不成熟。他们想的也就是供给制、平均主义、集体主义，集体生产、集体食堂、甚至拆散家庭、搞分男女集体住宿，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想象力，也就是这些了。而这些极大地压制个人权利，与马克思倡导的人的充分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完全背道而驰。

所以，从那以后，对共产主义的具体模式就再也不谈了，直到现在也不说了。两个一百年，讲的也不是共产主义。但是，对于一个被说成是千百万人要为之终生奋斗的事业，却语焉不祥，不说也不提，是令人奇怪的，也是不正常的。

现在有两个方面不说也不提，一是大饥荒、文革这些左倾灾难，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共产主义社会到底是啥样。一个是曾经走过的路，一个是未来的方向。

由于共产主义理论的不成熟、不完整，问题就出来了。不少国家的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以后，由此走错了路。

这表现在：依旧是暴力革命的思维，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权的新的社会形态里，还是以暴力手段为法宝。用暴力夺取了政权，也还是用暴力维护政权。哪怕是在人民内部，哪怕是当年自己的老战友之间，一概都毫不留情，翻脸不认人。生怕别人也照此办理，反过来夺了自己的权。稍有不同意见，就非要弄得你死我活不可。

同时，也正是共产主义理论尚有不成熟、不完整的地方，才需要继续发展，也才有继续发展的余地，它才不是凝固的、僵化的东西。共产主义理论，需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发展。比如，共产主义理论说，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里面的一个阶段，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话，马克思没说，是苏联的理论家说的。但即使是这样，看来也是过于乐观了。现在我们说，目前我们建设的还只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就是对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发展。

当前我们推行的不少政策措施，应该说与共产主义原则是不相符的。当然，这并不是

说做得不对。而是说我们离共产主义尚属遥远。在目前的几百年里，我们还是要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去。建设社会主义，仍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拿出几代人的全部思想和力量，切切实实地把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好。过去几十年国内外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好高骛远、急于求成、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经验教训，也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这几代人、十几代人能够建设起一个民主、繁荣、富裕、稳定的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就能对得起历史，对得起我们的先辈，对得起我们的后人。同时，这也并不妨碍我们继续对共产主义的向往。而且，到那时我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也会更成熟、更科学、更有实际指导意义。

假“左派”会说，你这是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其实那些人才不把共产主义当回事呢，恰恰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才更厌烦共产主义理论。你以为那些表面上提倡唱红歌的人，就真的喜欢共产革命吗？

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正是他们所害怕的。这个特征，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就是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共产主义是自由人联合体。我之所以仍然相信共产主义，原因就在于此。共产主义是政治信仰，是理想。共产主义要打碎一切枷锁，实现一切人的平等自由、天下大同。那些人害怕的、不愿触及的也正是这一点。如果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民主的自由的权利，那就没有他们特权阶层存在的余地。

共产主义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要实现这一点，就一定要有一个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没有这一共同点，怎么会有全人类的解放呢？各国人民怎么会走到一起呢？人类不但有共同的价值理念，也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向往。建设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要建设好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

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他没有讲“推翻旧世界”、没有讲“打倒帝国主义”，而是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他解释说：“人类命运共

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繫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成現實”。“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念，让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让人人享有富足安康；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理念，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人类家园。”

这正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那些特权阶层正在竭力否认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其实就是用左倾思维里的阶级性否认有全人类共同的人性，否认有全人类共同的美好的东西，而把他们一己的利益说成是国家的利益，说成是民族的利益，说成是党的利益，就像过去说成是阶级的利益一样。他们既想要维护自己的财产，又想要剥夺别人的财产，他们对共产主义既不想说，又不敢不说。他们所说的“解放”，其实就是“武力打天下”。

同时也应看到，也有人出于对左倾灾难的巨大伤痛，而否定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不切实际的，不过是蒙骗人民群众白干苦力的幌子。这种观点也不对。所以不同程度出现这些问题，主要不是共产主义的问题，而是那些利用共产主义作为幌子的人。不能说社会主义就是负资产。波尔布特那些假社会主义才是负资产。

最近，有人提出“可以允许共产党员信宗教”，这又是一种奇谈怪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在意识形态上最后的底线，就是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共同政治理想的团体。这个共同理想就是共产主义，他都要去拜菩萨了，还会去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吗？我觉得，现在对党员，尤其是对党员领导干部，要求太低太松。既然还叫共产党，那

对于没有共产主义政治信仰的，就应该一律清除。对那些贪污腐败、腐化堕落的，对那些以权谋私、拉关系走后门、包小三、吃空饷、欺压百姓的，包括信教拜佛的，等等等等，就应该一律清除。对照起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那些人连个边也挨不上，清除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让人感到莫名的是，为什么对这些现象下不得手呢，以至于到处泛滥成灾、难以收拾，还不是手上有权的一些人有私心杂念啊。连登记和公布官员的个人财产也要拼命反对，还去讲什么共产主义呢。（至于私营业主可以加入共产党的问题，这儿也暂不讨论了。）

其实，不要说共产主义了，就是连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啥样，又讲了多少呢？

当然，我们的思路也可以更开阔一些。对于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思考，不必仅仅着眼于还有几个党在执政，社会主义国家的版图扩大了多少，更要看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是在怎样地发展变化，能不能适应历史前进的步伐，能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不是真的是那么回事。况且，社会主义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它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请见：《学习时报》，2011年7月11日）同时，它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又可以有多种的模式，可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别的模式的社会主义。只要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就是社会主义。

2011年6月23日的《南方周末》还刊登了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博导王建民教授的一篇文章，文中讲到，“瑞典全民从摇篮到坟墓国家全包，贫富差距小，工人阶级是社民党的重要基础，其纲领里写明马克思主义是其思想来源之一。”他反问道：“为什么瑞典不可以叫社会主义？”其答案不言自明，瑞典也可以叫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同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和我们不一样，就不能是社会主义了吗？正因为社会主义有多种思想来源、有多种社会模式，它才会有比较、有发展。更何况，能不能叫社会主义，最终裁判权不在我们手里。

唯有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却与社会主义基本因素风马牛不相及的假社会主义，那才不是社会主义。比如波尔布特那一套，比如极左势力那一套，决不是社会主义。美国左派思想家马尔库塞说得真好：“社会主义世界，同时是一个道德的和美的世界。”（请见：《工业革命和新左派》，马尔库塞，商务印书馆，1982年）社会主义社会决不是极左势力下的那种打打杀杀的屠宰场。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大障碍，就在于假社会主义。

对于一些实行社会主义条件暂不成熟的国家和地区，也不一定非得实行社会主义才算对。勉强行之，只能适得其反。正如邓小平在接见非洲友人时说：“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请见：《财经》2008年第26期）■

【述往】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七）

——不退黑材料的平反·后记

宋翔雁

高院长为我平反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全国人心大快。人们在经历了十年多的磨难之后，多么期盼着能够尽快过上安稳而舒心的日子呀！说真话，老百姓的要求真不高，只希望今后能平平安安过上安稳的日子，吃喝差点都没关系，大家想的只要家人们能生活在一起，孩子们能有学上，有活干就成了。不要再为今天这个亲人，被揭发、批斗，明天那个亲人又被审查、关押，今天这个孩子上山下乡、明天那个孩子在家待业，让人们总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就成了。可惜就这么简单的愿望，在那令人恐怖的十年里，都成了人们难以实现的梦想。如今总算有了盼头和希望，人们上街游行，在家谈笑风生的议论，买串“三公一母”的螃蟹

边啖食其美味，并忖度着对他们这帮祸国殃民之辈真应将其碎尸万段以谢国人。当然，数十年来国人没有经历过很好的公民教育，在痛彻心扉的情感蛊惑下生成的这类复仇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能够理解的。

大约在1976年底或77年初，我在唐山接到武汉的电报，让我回京去留守处，说高院长找我有事。到京后，留守处让我先等一下，说要与高院长联系后再定时间。她们电话联系后，告我：下午三点后，高院长在家等你，并告知了高院长家的地址。当我问找我何事时，她们说自己不清楚。

我如约准时到了高院长家。别人领我进屋后，高院长从沙发上马上站起来，当我给他老人家鞠躬问好后，他老走过来和我握握手，并让我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下。高院长来地院主持工作已经十八个年头了，而我在地院工作也十五年有余，但能坐在他老身边听他教诲这还是第一次。我真的想不到他老人家为何要找我，又要和我谈什么？但因院长的为人我熟悉，所以我没有一点紧张但略有拘束。坐下后，高院长让家人给我倒了杯水，让我先喝点水。接着问道：你是从唐山赶来的吧，在那边搞什么呢？我简单地回应了院长的问话后，他说道：这很好嘛，文革十年还没有把业务丢掉是好事。今天打断你在那边的工作，让你回来主要是对你的所谓“五一六”问题宣布给你平反，同时还想听听你对此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高院长说话时的语气极其平和，说完后双眼注视着我，等待我的回答。

听了高院长宣布和问话后，不知怎地，我内心似乎没有太大的反应，既不感到高兴，也没有什么惊喜。相反觉得也很平淡，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事罢了！但有一点我不想隐瞒的是，能由高院长为我平反，心中感到宽慰，因为他毕竟是深深让我敬重、爱戴的院领导人！高院长和蔼可亲善待年轻人，他没有因我一时语塞而着急，仍很和蔼地看着我。整理好自己的思绪后，我说道：我感谢高院长为我平反，但我听说您已经从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这时我见高院长点了点头），所以我不清楚您今天的谈话是代表院党委还只是您个人的意见？高院长听后说道：你说得对，组织上已经让我退下来了。但这次找你谈话，宣布给你平反，却是党委会上的决定，并委托我来执行的。因退下来后我就回到北京家中，而你

又在唐山搞科研，找你回京比较方便，所以我就接受了这一任务。

接着，我又问道：按政策规定，平反时应将审查期间我个人写的揭发批判和交待检查材料一律退还本人，不知此事准备如何处理？对此，高院长对我说道：你所说的这些材料，今后肯定会退还给你的。但目前地院处于一个特殊时期，清查“五一六”的材料目前全部都封箱存在不同地点，眼下也没有足够的地方开箱整理和清查，只能等日后学校建设到一定阶段，有了足够的地方时，方能完成此项任务。对此，我想你是能够理解的。最后，我向院长提出能否将给我平反一事通知我专案组的成员周××时，他老问了一下周的情况后，对我进行了劝解，希望我不再坚持。我接受了院长的劝解，并说道：对于清查“五一六”运动一事，我再无其他要求了。因谈话已经持续了近一个小时，为了不影响院长的休息，说完我再无其他要求后，就起身向高院长告辞了。高院长也站起来，问我是否还回唐山，我点头回答了他的问话。他老一定坚持要送我走出他家的院门，出了院门，我向高院长深深鞠了个躬，相互握握手并道保重后，我才转身离去。

这次在高院长家的停留，成了我一生中难于抹去的珍贵记忆。此后，我与昭明还在春节时期同去高院长家看望和拜年，这一次恰好杨光荣同志也在，他还让我们与高院长夫妇一起，在院长家的大门外拍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还刊登在六十周年校刊纪念册上，成了我们和高院长在一起的永恒纪念！

应当指出的一点是，自高院长正式向我宣布平反后，我先后于1977、78年多次找过院领导，包括当时负责处理冤假错案善后事宜的陈钟慧付院长数次，问其何时能退还整我“五一六”时的材料，但都躲躲闪闪，从未给过令人满意的答复。这种视党的政策为为儿戏，不能面对受害群众负起基层干部应负责任的渎职行为，确实令人气愤。这也是现今许多中下层干部不得人心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已经丢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所言所行要对人民负责的基本要求。最后我也不再为退回材料的事情去找他们了，因为我深信，这些材料不归还给我，只能说明他们失职，而不可能再成为加害于我的任何证据！

不得不提的一个人

在本文结尾前，我还想提一位我极其不愿再提的人，他就是陆炎德。尽管此人已经故去，再对死者揭丑似乎有失为人的厚道，但我内心一直提醒着我，应当加以揭露，好让善良的人知道，而今的世上，仍有这类人存在，要记住，他们是会害人的！

陆炎德是我大学同班同学，而且后来我们还是一个系的同事。只不过他后来一直在探工系党总支工作，成为一名专职的政工干部（他文革前任系总支宣传委员）。因我们之间工作性质不同，加之也没有什么共同爱好，所以彼此间并无什么私人交往。

文革前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游手好闲之辈，上班时间经常能看到他东走西串，这坐坐、那聊聊，晚上则以他的房间为基地打麻将，满屋乌烟瘴气的。所以也遭到一些人的议论。但尽管他是名政工干部，但又不像某些党员那样左得厉害，总以改造他人而自居。相反，他和任何人交谈总是不显山不露水的，慢悠悠的从不见他训斥过人。所以也能招揽一些人与他结交，聊天打牌。

但此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爱占小便宜。典型的事例是，在食堂排队打饭时，经常人们会发现当他付钱时（食堂均使用内部粮票和菜票），总会发现他会因缺一两分钱而向身后的同事们“借”，当然别人也会欣然借给他，因为任何人都会有钱没带够的情况。但殊不知，他与别人偶尔钱没带够不同，他的这种“借”乃大有“学问”。一是经常的“借”；二是，从来不还。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即若今天是向你借的，那明天肯定是和别人去借。但因一次的借用数量都不大，只是几分钱的事，所以谁也不会放在心上，过几天后也就忘记了。于是过些日子后，他又很自然地会向你再“借”钱，而你也因忘记他前次的钱还没还呢，又痛痛快快的借给他了。一再反复、周而复始地，他总能达到借钱不还的目的。但这种龌蹉事还是让一位细心人发现了，只是不好意思公开说穿，而在下边用和私交打个招呼的方法，让其避免上当罢了。但每人都有私交，故日久后，几乎系里的人都知晓了。当初，我只觉得这只不过是贪小便宜的小事，但经过抓“五一六”后，我才认识到，从此事就可以

看出他工于心计的政客嘴脸是无处不在的。

此人在地院文革运动中并非公开出头露面的人物，但却似乎是一个无处不在的鬼魂。他极少在公开场合表露个人的观点、发表激昂慷慨的言论，至多也只是敲敲边鼓，说上几句起到引申他人观点或启发众人进一步思考的言辞。但在下面，他会各处走动，这听听、那看看，查看动静，掌握和了解下边的情绪和动向，必要时也会说上几句煽情的话。对此，过去只是幼稚地认为，这是他工作性质决定的，也是他开展工作，了解情况一种方式。当探工系教职工第一张大字报蕴酿、讨论时，他的表现也是如此。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他是个军师角色，从不冲杀在前为人知晓。

经过文革，特别是经过抓““五一六””后，才让我看清，这是搞政治投机高手们一贯视为护身符的城府之术。采用这种方式，就可在复杂、纷乱的政治斗争的环境里应对自如，并保护自己。地院文革中后期大抓““五一六””，打击面之宽、所用手段之卑鄙、残酷，尽管与军宣队所执行的极左路线密不可分，但也与陆炎德从一开始就欲盖弥彰的伎俩，想借把水搅浑使他自己得以脱身有关。如军宣队在诱逼我交代时，就明确告诉我：陆炎德已经交待了，地院东方红、革委会和““五一六””就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你们大家都是“五一六”分子，谁也跑不掉。这里应当说明，此后我并未向陆炎德本人去证实此说法是否是他向军宣队交代的原话。但我敢肯定，即使我去向他求证，他也会断然地加以否认，此乃其政治品质之使然。但我深信不疑，“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这样的话出自陆某的口是完全可能的，他有那种想象力和智慧，正因此，他才获得了军师的美誉嘛！殊不知，正是这句话，害了多少地院的教职工和当年的小将们！当然，公平地讲，没有这句话，军宣队按中央抓“五一六”的指示，把文革初期的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分子也是必然的，只不过“两块牌子”论更能为中央要抓造反派提供了一块绝佳的遮羞布罢了。估计正是因为陆某人有提供遮羞布之功，故不仅在运动中并未受什么大罪，甚而运动后期还得已调离学校，通过政审娶到了一位部队高干王××（54年授衔时的将军，据说当时恰为武汉军区的高层领导）的女儿为妻，当上了部队高干的乘龙快婿。

当我1972年11月回京后，陆曾两次找过我（一次是到眷三楼我家里；第二次是在北校门门口，看样子是有意在等我），想跟我解释点什么。但基于我对他的认识，两次我均回绝了他，而且在北校门处，我甚至说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今后老死也不再与你往来！此后他也就没有再找过我。如今他早已作古，再说这些显得自己似乎不很厚道，也无意义，但我内心中留下的心结真的很难释然。所以在八十年代后期，听说《中国青年报》（或《中国青年》）曾在一篇报道中，以正面形象报道过他与其第二位夫人的事迹，鼓噪让人们学习。此事发生后，原我系白明义老师曾找我，说要写信向上级有关部门揭发他。当时我对白说：现在我非常忙，确实没有时间，而且我也不想参与此事。但我可以告诉你，谁和这种人搅合在一起，都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听后，白老师没有勉强我，但事后他是否写了揭发信我就不得而知了。

后 记

我的回忆写完了，尽管自己费了很大力气，但限于水平，我知道很难表述得完美，相关的分析也很难说全面、正确。但就个人知道的事实和内心情感的述说而言，我可以坦诚地说是真实的。同时，我还想说，这段历史的回忆，在我是经历了极大的情感冲击的，有一段时间真有点写不下去的感觉。但面对很多人的支持、鼓励、关心和帮助，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我终于坚持下来，完成了自己的承诺。

因我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文革参与者，涉及到的重大事件极少，涉及的内幕几乎没有，所以对揭示历史真相所能起到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但我毕竟目睹了文革十年血淋淋的历史，而且自身也深受其害，所以我对文革给人们带来的灾难的感受，对众多希望了解文革漠视人权、践踏人权、让人们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甚至亡命他乡的悲剧的真实性，可能会有所助益。若能有此效果，则可达到警醒人们的作用，这样，我的心愿也就达到了。

在此，我要再次感谢陶世龙老师对我的鼓励，感谢蔡新平、孟繁华、朱德瑜等同志对我的支持。还要感谢吴迪老师指点我先把想写的事写出来，再对写出来的这些事进行梳理

并成文的方法，从而使我迈出了苦熬月余无从下笔的窘境。

当然，我最该感谢的是我的爱妻，即使在她患病阶段，仍全力担起了整个家务，给我尽可能多的时间，好让我能安心去思考和写作。同时，她还是这份回忆的第一位读者和文稿的校对者。读后，她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修正。此外，她口述了在我被隔离审查期间所经历过的艰苦岁月和心路历程，也更生动、更形象地告诫人们文革对无辜者的蹂躏和伤害。可以说没有她的这份辛劳和支持（她坦诚的说，这是孟繁华在下边私下里对她的要求。她答应了，就得做到），我还不知道何时才能兑现自己对陶老师和众多“小将”们的承诺呢？！总之，我是欠她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只希望今后我能还清这笔欠债，以求心安！ ■

作者完稿于 2016. 4. 26. 夜

【考 证】

“新北大公社” 打压 “井冈山兵团” 的 “干钧棒” （上）

——《新北大》关于“红旗飘、牛辉林”的评论

樊能廷

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正史《北京大学纪事》（2008 版）记载：

（1967 年） 8 月 17 日，“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和“北京公社”、“红旗飘”等五个造反派组织（简称井、红、团、零、飘）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周培源、李醒尘出席大会并讲话。同日，周培源参加井冈山兵团。第一届总部勤务员（核心组）有周培源、侯汉清、郭罗基、牛辉林、徐运朴等 11 人。第一任核心组组长周培源，副组长牛辉林、徐运朴、陈醒迈、侯汉清（后改为牛辉林任组长）。“井冈山兵团”的成立，标志校内两大对立的造反派组织正式形成。

【笔者注：《北京大学纪事》此处“井冈山兵团第一届总部勤务员（核心组）有周培源、侯汉清、郭罗基、牛辉林、徐运朴等11人”记述有误，应该是“9人”，而且没有郭罗基。】

反聶元梓校文革的“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命运多舛：出生了，没过“满月”头上就被套上一道“紧箍咒”——聶元梓一派说，9月1日，江青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上讲话“‘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牛辉林到处抢、抄。”

对于北大的两派，江青和“中央文革”支持聶元梓、支持新北大公社，打压井冈山兵团，历史事实是十分清楚的。

“江青讲话”抛出这个话柄，就成为聶氏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不惜余力地打压“井冈山兵团”而日夜挥舞的“千钧棒”，也成为“井冈山兵团”蹒跚前行中，不得不拖着的一副沉重镣铐。

北大“团、零、飘、井、红”五家联合成立“新北大井冈山兵团”，相比之下“红旗飘”人丁稀少，不足百人。加之江青的讲话直接针对“红旗飘”精准打击，“红旗飘”就成为时时被聂派捏个不停的“软柿子”。

“红旗飘”的头头是北大法律系学生牛辉林，也被江青这一讲话点了名，他就成了聂派的政治打击和舆论攻讦对象，旁及他人甚或旁及整个“井冈山兵团”的时候，习惯于指称为“牛辉林之流”、“牛辉林们”、“牛头山”这样的字眼儿。

【笔者注：文革中，多少群众组织因为上面一句话，就垮了，自身挨整不算，还要波及九族，甚至有至今翻不了身的。牛辉林夫人唐竞，在收入自印本2015年《怀念牛辉林》第202页的《想念牛辉林》一文中记述：1967年8月17日，这五个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人数占了全校的一半以上，推举周培源校长为核心组组长。一周后，周培源辞去核心组组长并推荐牛辉林接任。上任一周，牛辉林就辞去了组长职务。原因是，9月1日，江青说“红旗飘”里有坏人。他不想连累“井冈山”。为了整垮“井冈山”，校文革大整所谓的“反动小集团”，把牛辉林打成“反革命”。】

本文引用北大文革校刊——“校文革”机关报《新北大》刊载的涉及“牛辉林”和“红

旗飘”两个关键词检索得来的白纸黑字，按照时间顺序，作一叙述。

北大聂派“校文革”奉江青九月一日的讲话为克敌制胜的法宝，以江青讲话为主题，生发出无限的意象、做了无数的文章。充斥字里行间的霸气、杀气、戾气和一擦一擦泰山压顶的政治帽子，夹杂众多“乌龟王八、叭儿狗、狗洞、渣滓、垃圾、匪首”等毫不掩饰的诟骂，一目了然，无不显示当时“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浩然之气”。

* * * * *

1967年9月7日《新北大》113期第二版，捉牛鬼《把“红旗飘”里的坏人揪出来！》说：

江青同志最近在代表中央的讲话里严正指出：“‘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现在这一小撮坏人早已随着“红旗飘”爬进了“井冈山”兵团，我们必须马上把他们揪出来！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谁包庇坏人，谁就是对革命的犯罪！如果发觉了坏人而不揭发，那不是“私”字作怪，就是别有用心！

对于一个组织里的坏人，应当采取群众专政的办法。“红旗飘”“井冈山”里广大群众是好的，希望你们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真正站在人民方面，毫不留情、痛痛快快地把自己队伍里的一小撮坏人揪出来斗倒斗臭！这是对你们的考验！

1967年1月1日《新北大》1期第八版，新北大公社红11团“顶风船”《牛辉林的诡计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说：

最近几天，北京市阶级斗争的形势急剧变化。几个月来，挑动北京市两大派斗争，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恶黑手，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在广大革命群众面前。那些被这只黑手牵动的喽罗们，感到大势不妙了，他们开始给自己找寻新的出路了！

九月四日晚上，在井冈山兵团的串连会上，牛辉林以总部发言人的名义作了一个短短的开场白。他说：“井冈山前一阶段大方向完全正确，但是有严重政治错误，忽略了大方向。对聂元梓火箭上纲，提出了过左的口号，今后我们应该全力抓大方向。”等等。这真是一篇绝妙的发言。牛辉林在作舆论准备，他要溜了！

牛辉林说什么“前阶段忽略了大方向，现在要抓大批判”了。如果牛辉林之流真要易弦更张，改邪归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是表示欢迎的。但是无数事实使新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认识了牛辉林之流。他们的“抓大方向”，不过是在形势不利的时候，做个样子给人看看，为了保护自己暂时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待内战时机一到，就把大批判置于脑后了。人们总该记得七月三十日以后的几天吧，牛辉林之流因为打、砸、抢、抄，众叛亲离，内外交困，民怨鼎沸，不得已只好抓了几天大方向；不久，日子好了些，就又挑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现在，牛辉林见形势不妙，又要弄起惯技来了。

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就形势问题做了重要讲话。江青同志说：“有一只黑手，不但在打你们革命小将的主意，还在打我们中央文革的主意。”江青同志指的这只黑手是谁呢？牛辉林之流及其黑后台心里是最清楚的。他们预感到末日即临，于是贼喊捉贼，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兴师动众，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聂高潮。他们把聂元梓同志打成“黑手”，妄图保护真正的黑手过关。他们无中生有，造谣惑众，集中兵力，全面进攻，把个好端端的新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他们利令智昏，叫嚷新北大公社的“沉舟”快要“淹没”了。然而，事实与他们的黄粱美梦相反：天没有塌下来，新北大公社在大风大浪中又经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验，变得更加坚强了。九月一日，中央首长又对当前运动作了重要指示，江青同志严肃指出：“‘红旗飘’（按：牛辉林的嫡系部队）里准有坏人，牛辉林到处抢、抄。”中央首长的讲话，揭开了北京市两大派斗争的盖子。同时，也宣判了牛辉林之流“倒聂运动”的彻底破产！牛辉林的祖师爷倒台了，噩耗传来，井冈山人心惶惶，动荡不定，牛辉林见势不妙又使起了他的惯技，赶紧指挥他的党羽，布置“退却”，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作为权宜之计，重磨利剑，以待东山再起。

牛辉林要布置退却了，他十分巧妙地找到了两个借口。一个借口是：我们在聂元梓问题上“有错误”，“火箭上纲”，提出了“过左的口号”。好一个“过左的口号”，把聂元梓同志打成“黑手”，全市宣传，甚至贴出海报要斗争聂元梓同志，从不嫌“左”；大造舆论准备，要来“二次革命”、“全面夺权”，从不嫌“左”；什么“聂元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65例”、“三十五个为什么？”等等，到处印发，何等得意！什么“聂元梓一定要打倒，聂元梓一定能够打倒”等等，又何等自信；对这些口号从来没有嫌“左”，相反地，还在一直“反右倾”，怎么现在却一反常态，反起“左”来了呢？历史无情地嘲弄了牛辉林之流，聂元梓没有被打倒，孙蓬一没有下台，新北大乘风破浪胜利前进，牛辉林之流彻底失败了。但是牛辉林又不愿认输，只好故作高姿态，“打肿脸充胖子”，扭扭捏捏，推说口号提“左”了，说得何等轻松啊！

牛辉林退却的第二个借口是：“我们忽略了大方向”，“抓得不够”，“有缺点”，拍，拍，拍！自打耳光何其响亮！想当初，高叫“批判聂元梓对全国运动有很大意义”的不是你们吗？提出“批判聂元梓就是大方向”的不也是你们吗？你们抓反聂的大方向真是牢得很，谣言攻势强得很，何曾忽略过？如今，牛辉林声称要抓大批判，想拍拍屁股，溜之大吉，把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转移斗争大方向，攻击革命左派，搅乱阶级阵线的罪行推脱得一干二净，这能够办得到吗？

牛辉林的发言说明井冈山阵地已经开始全线崩溃。我们相信井冈山广大革命群众决不是听任牛辉林任意摆布的阿斗！他们正在思考这几天来校内外发生的变化，正在学习中央首长的重要讲话，他们一定会透过纷繁复杂的阶级斗争现象，逐步认清牛辉林之流在北京两大派斗争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充当了谁的打手？井冈山上的革命群众一定会响应江青同志的号召，把井冈山一小撮坏人揪出来示众！

1967年9月18日《新北大》1期第四版，07红旗《牛辉林之流打自己嘴巴》说：

新北大有两句民谣，曰：“牛头山（指牛辉林之流操纵的井冈山）上三件宝，武斗、

造谣、捞稻草。”这是何等准确、鲜明、生动啊，它画龙点睛地勾画出牛头山头目们的政治流氓咀脸。

徐运朴对待聶元梓同志——去年十二月份到一月份，徐说：“反聂就是反动！”“保聂保定了！”“保聂光荣，老子有功！”“谁反聂，我第一个跟他拼了。”

参加井冈山后，徐运朴大骂“反聂即反动是混蛋逻辑！”

牛辉林之流六月份到八月份骂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是“老保”，同时和“新三军”勾勾搭搭。

1967年9月21日《新北大》118期第二版，社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论我校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实行大联合》说：

江青同志早就提醒我们说，红旗飘里准有坏人，最近又进一步严正指出，北大已经是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了。中央首长的谆谆教导，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1967年10月12日《新北大》124期第四版，红旗兵团横扫千军《彻底分析北大老保翻天的逆流》说：

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胡根初也加入了“红旗飘”，参加了抄、抢、砸红二组和历史系档案室的行动。

江青同志讲：“红旗飘里准有坏人。”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论断。这一小撮坏人终将会被革命群众一个一个地揪出来！

1967年10月15日《新北大》125期第二版，原新北大井冈山兵团05纵队孙文平《井冈山兵团头头执行的什么路线？》说：

江青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红旗飘里准有坏人”。根据兵团头头所干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我们可以断言，这个坏人已钻入了兵团总部，并且决定着兵团的政策，左右着兵团的方向，控制着兵团的大权。为什么大批牛鬼蛇神都纷纷向井冈山靠拢，难道井冈山兵团的决策机构里没有他们的代理人吗？

1967年10月19日《新北大》126期第四版，新北大公社红工兵《牛辉林之流是怎样和林杰反党集团勾结的？》说：

曾经名噪一时的“大左派”林杰之流一小撮反党小集团被暴露出来了。但是，林杰之流进攻新北大红色政权的先锋官——牛辉林之流还妄想遮掩自己与林杰反党集团的联系，把自己伪装起来。让我们剥去牛辉林之流的伪装，看看他们的真面目吧！

他们抓住国际饭店会议上一些左派同志的所谓“检查”大做文章，于是“北大要整风，聶元梓第一个要整风”的大字报于三月五日出笼，牛辉林之流竭力煽动群众大反聶元梓同志。

一月三日，牛辉林以北京大学红卫兵的名义，与一些组织打着“批陶联络站”的旗号进驻中宣部，在林杰之流的指挥下，打击迫害革命左派阮铭同志，狂呼“阮铭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一月三十日，林杰之流指挥牛辉林之流和一些人再次斗争了阮铭。

去年五月二十三日，狗特务吴传启在林杰之流的授意下，贴出了学部第一张大字报。今年五月底，牛辉林之流居然抄贴了这张大字报，别有用心地加了按语说“这张大字报比聶元梓的还要早两天。”

六月上旬，老特务穆欣派人到北大参加了牛辉林之流举行的所谓的“批判聂孙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注，百度，高文秀《中央文革小组实录·穆欣》：1967年9月江青诬陷穆欣是“特

务”，从此穆欣被关进秦城监狱八年，1975年5月释放。1979年12月调任外文局副局长，1980年7月兼任人民画报社社长、总编辑。1984年4月离休，因病于2010年9月3日逝世，享年90岁。穆欣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1967年10月25日《新北大》128期第二版，简明新闻《反共老手侯仁之、周一良被揪出来了》说：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侯仁之是一个反共老手，所谓“左派教授”的画皮已被撕破。在井冈山一小撮坏人冲砸红色保卫组时，他主动站岗、监视我保卫组工作人员，一天一夜，得到牛辉林之流的赞扬。

1967年11月9日《新北大》132期第一版，社论《砸烂旧北大，创建新北大》说：

旧北大是一个“池深王八多”的地方，也是一个各种“王八思想”十分顽固、帝资封修百货齐全的黑店。它们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涛怒吼中，已经是七零八落、不可收拾了。但是，这股顽固势力还没有被彻底摧垮，它的阴魂还在寻找活尸，它的流毒还没有完全肃清。被林杰反党集团操纵的牛辉林之流，是“老保翻天”的庇护所，是企图颠覆新北大红色政权的大本营。在教育革命的风暴铺天盖地而来，将彻底摧毁旧北大的时候，牛辉林之流伙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一次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牛辉林之流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上说：“中等以上教师在我们这边，你们教师不够，我们给你们几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最新指示广播后，贴出了“要抗大，不要燕京”这样充满革命豪情的大标语，表达了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革命批判的大旗，彻底闹革命的决心。然而这一条标语又刺痛了牛辉林之流，他们匆匆忙忙地贴出了“要周培源，不要陆平、彭珮云”的标语，公然把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作旗帜抬了出来，明目张胆

地对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一最高指示。

1967年11月16日《新北大》135期第三版，原井冈山兵团西语系五一纵队英一刘学成、肖景仁、方文礼、周志浩《造反声明》说：

孔、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案翻不了。

井冈山兵团成立以来，牛辉林们背着广大战士，和林杰反党集团勾勾搭搭，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使兵团为反党集团所利用，倒聂倒孙运动，搞垮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大方向完全错了。这就给老保翻天造成了可乘之机，但牛辉林们至今坚持错误立场，死不悔改。

牛辉林们千方百计否认校文革的领导，这种企图必定失败！

1967年11月19日《新北大》139期第三版，长缨《“井冈醉翁”的故事》说：

在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指示的鼓舞下，新北大公社战士响亮地提出了“要抗大，不要陆平、彭珮云”的革命口号，井冈山兵团的牛辉林们却气急败坏地贴出了“要周培源，不要陆平、彭珮云”的大标语，以与新北大公社相对抗。牛辉林们的叫嚣，立即受到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痛斥。【笔者注：原标语“要周培源，不要崔雄崑”，是“井冈山”化学系0363“慨而慷”一位同学自己用石灰水刷写的，不是“井冈山兵团”的“组织行为”。

“要周培源，不要陆平、彭珮云”则是“新北大公社长缨”的窜改，在原标语出世隔一两天后，刊登在文革校刊《新北大》上，反应够快的。后来的故事是：1968年10月16日晚，在63军军宣队主导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校文革常委、新北大斗批改委员会负责人、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副组长”崔雄崑从清队集中地出走，在红湖游泳池“投水炸肺死亡”。再后来的故事是：1978年7月20日下达通知，“经华主席、党中央1978年6月27日批

准，周培源同志为北京大学校长。”】

牛辉林们不甘心失败，一会儿拍胸脯给自己打气说：“你吹你的冷气，我开我的花”；一会儿又使出了“倒打一耙”的看家本领，要把聶元梓同志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这些鬼话没有人听的时候，“英雄”的井冈山人又悻悻然说：“那是我兵团一个战士喝醉了酒，在昏昏沉沉之中写的，你们知道吗？”原来如此！牛辉林之流为掩盖自己的丑态，推出一个“井冈醉翁”来当替罪羊了！妙想天开，闻之令人捧腹。

俗语曰：酒后吐真言。姑且不论此话是否有理，但牛辉林们“要周培源”，那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把这位喝足了美国牛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培源捧为“革命前辈”而把他抬上了井冈山兵团第一把交椅的，不正是牛辉林吗？在这位“德高望重”的周先生坐镇山寨之后，狂叫“一切权力归井冈山”的，不也是牛辉林们吗？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这些都是你们“喝醉了酒，在昏昏沉沉之中干出来的”？“英雄”的井冈山人，这该是《天方夜谭》的第几夜啦？

牛辉林们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仅会武的——打砸抢，还会文的——编故事。这段“井冈醉翁”刷大标语的故事不就编的很奇妙吗？不过，这种奇妙的故事，只有“牛”的同类——鬼才相信。

1967年11月25日《新北大》增刊第四版，新北大公社红旗兵团、轻骑兵、横扫千军、铁骑《牛辉林们勾结狂派毁我长城的铁证》说：

为了替林杰反党集团效犬马之劳，牛辉林之流，一马当先，怀着强盗和赌徒的心理，跑到石家庄，充当了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急先锋。【笔者注：①1968年2月8日，《新北大》第152期第三版，0263“八一兵团”文章《忆昨日太行山下战恶风，看今朝滹沱河畔大旗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崔田民，是高岗十三太保之一，是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的坏人。为了揪出反军罪魁崔田民，（1967年）8月12日，新北大公社“八一兵团”数

十名战士和石家庄革命派一起，冲破了重重阻力，揪斗了三反分子崔田民。同时在他的狗窝里发现了大量的崔贼所整理的有关三军党委、4587部队和新北大公社的黑材料。9月，我新北大公社“八一兵团”又和河北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创办了《揪崔战报》，以大量铁的事实，揭露了崔田民大反解放军的丑恶嘴脸，痛斥了崔贼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响亮地提出了“斩断黑手、揪出崔贼”的战斗口号。1968年元旦，陈伯达同志又一次指出：“下一步要乘胜追击，要攻农大造反团，要崔士林交代与崔田民的关系，崔田民在石家庄破产了。崔田民是破坏石家庄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石家庄牛鬼蛇神的总后台。”伯达同志的讲话，宣告了崔田民之流和关王林集团的彻底失败，宣告了反军狂派的彻底垮台，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了完全胜利。②《北京大学纪事》记载：“（1967年）8月12日，新北大“八一兵团”和石家庄“揪斗崔田民联络站”共二百余人冲进铁道兵司令部大院，抄家、抓人，并撬开保密文件柜，抢走2409份文件，造成严重失密。”】

1967年12月2日《新北大》139期第二版，红旗兵团横扫千军《是谁破坏复课闹革命》说：

《人民日报》11.26社论发表了，这是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极大的鼓舞。可是，牛辉林们，不是根据社论的精神为搞好我校的复课闹革命出力，而是抓住社论的只言片语，想从这里捞到什么油水乘机向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猖狂进攻，声嘶力竭地叫嚣什么“聂孙之流破坏复课闹革命”啊，“聂孙之流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啊，等等，倒打一耙，俨然像一个捍卫大方向的英雄。然而，诡辩篡改不了历史，牛辉林们破坏复课闹革命的罪行是赖不掉的！

牛辉林们充当了一个反面角色。他们自己不搞革命的大批判，还千方百计地反对别人搞革命的大批判。

牛辉林们回避问题的要害，抓住表面现象，攻击事物的本质，恰恰说明他们是复课闹

革命的破坏者。

牛辉林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上，完全充当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同期第三版，短评《一个极其重要的措施》说：

牛辉林之流把广大革命干部视若仇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依靠三反分子戈华、反共老手周一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培源之流；他们纵容老保翻天，为复辟旧北大张目，他们的政治纲领决定了他们必然反对革命的领导干部。【笔者注：戈华、周一良、周培源果然在文革后的“改革开放”中各就各位，全都“复辟”了。】

1967年12月9日《新北大》141期第三版，本刊记者《评孔杨上台后井冈山兵团的新动向》说：

蓄意挑起武斗——上帝叫他灭亡，必先使它疯狂！为了挽救井冈山兵团彻底失败的命运，孔、杨、牛辉林之流肆意践踏“六·六”通令，连续挑起武斗，大搞打、砸、抢，疯狂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孔、杨、牛辉林之流挑起武斗，其结果必定是搬起石头砸他们自己的脚。

海可枯，石可烂，孔杨铁案不可翻！【笔者注：孔繁、杨克明的案，毫不费力，都翻了，他们继续“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文革中利用手中一时权势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分子”的“社教左派战友”孙蓬一，上门跪地道歉、忏悔。】

我们要正告孔、杨，你们改正错误是可以的，如果执迷不悟，继续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伙同牛辉林之流，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绝没有好下场！

同期第三版，新北大公社红卫兵钢一连《活捉戈华，气死牛辉林们》说：

潜逃在外三个月之久的三反分子戈华，于12月3日被我英勇的新北大公社战士生擒了！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为之欢呼！只可怜井冈山兵团牛辉林之流机关算尽，脑汁绞尽，为戈华奔波劳碌，效尽犬马之劳，今朝唯有凄凄戚戚，向隅暗泣了。

牛辉林之流与这些阶级敌人同谋共策，同谋究竟是哪路货色难道暴露得还不充分吗？

同期第四版，新北大公社愚公移山战斗队《牛辉林之流就是林杰反动集团的马前卒——一再揭牛辉林之流是怎样和林杰反党集团勾搭的》说：

林杰反党集团妄图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阴谋败露后，作为林杰反党集团一手操纵的牛辉林之流，非但不低头认罪，反而怙恶不悛，拒不老实交代与林杰的黑关系，继续蒙骗广大井冈山战士，妄想挽救分崩离析的局面。这里，我们将牛辉林之流卖身投靠反党集团，充当他们进攻新北大红色政权的马前卒的铁证，再公布一部分，且看牛辉林们又如何狡赖。

今年四月份以来，洪涛之流和牛辉林们的勾结日益紧密。五月份，牛辉林和一个女的找洪涛，汇报他为什么“造反”，“分歧从何而来”等等，和洪涛之流密谋策划，如何“造反”。洪涛和牛谈了两个钟头之后，表示愿意帮牛整材料，负责上报。果然牛辉林们就通过统战民委联委上报材料。

1967年12月14日《新北大》142期第二版，新北大公社留班支队《从麻子英问题看牛辉林之流的政客嘴脸》说：

牛辉林之流却反其道而行之，把麻子英打为“老保翻天”。牛辉林们一天到晚恬不知耻地大叫什么“欢迎革命干部杀上第一线”呀，什么“聂孙文革迫害革命干部了”呀，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毛主席干部路线的捍卫者。当麻子英坚决表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站在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一边之后，牛辉林们便索性撕下假面具，凶相毕露，非要打倒麻

子英不可了。

同期第四版，本刊评论员《走自己的路，让牛辉林之流去哭泣吧》说：

牛辉林之流打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幌子，实际上他们代表的正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复辟势力，而他们拼命攻击的正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就是北大两派斗争的阶级实质。

许多井冈山战士反戈一击，造了牛辉林之流的反，参加了新北大公社的战斗行列，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我校的新胜利。

我们难道能让自己绑在牛辉林之流的战车上，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当炮灰吗？不！绝对不能。牛辉林之流的咒骂正是我们的光荣。我们走自己的路，让牛辉林之流去哭泣吧！

同期第四版，原井冈山兵团核心组成员郭景海《造井冈山兵团少数决策人的反》说：

八月初，牛辉林在一个会上曾经作过一个报告，把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描写得一团漆黑，而且中心思想是搞军内一小撮。我联系到江青同志说的，“红旗飘”里有坏人，而到今天坏人没有揪出来，这些问题是很值得思考的。

1967年12月16日《新北大》增刊第版，新北大公社工程兵部队、愚公移山、开山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说：

井冈山兵团的坏头头牛辉林之流，在兵团内部大耍资产阶级政客手腕，一贯实行愚民政策，这是举世皆知的。我们可以看见牛辉林之流到底是些什么货色。他们是不折不扣的

保皇派，关帝庙里的癞和尚，林家铺子里的店小二，丧家的陆平黑帮的乏走狗。只要稍微瞥一眼他们追随着关、王、林反党集团爬行过的轨迹，就不难看出：他们没有关帝庙祭品的饲养和旧北大深池中大小王八鼻液的浇灌，他们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牛辉林之流实行的这样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根本上违背了井冈山兵团广大战士的根本利益，这就必然使自己站在群众运动的叛逆者的地位。这样，即使在他们最疯狂的时候，他们的脚下也是一座岩浆喷薄欲出的火山。

最近，牛辉林们在穷途末路之时，又咬着牙抽出最后一张王牌——把北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孔繁、杨克明搬了出来，抬上摇摇欲坠的井冈山兵团总部核心组的宝座，并且大肆挑动武斗，疯狂打砸抢。但是，这不过是它们临死前的回光返照而已。

同期第二版，原井冈山兵团十九纵队仪器厂“井冈铁骑”李丽芬《造反声明》说：

林杰反党集团被揪出来了，关帝庙倒塌了，林家铺子垮台了，牛辉林之流的丑恶嘴脸更加暴露无遗了。牛辉林之流与林杰反党集团勾勾搭搭，和王恩宇、洪涛来往密切，并策划于密室，阴谋搞垮新北大红色政权和聶元梓同志。牛辉林之流长期造谣，愚弄群众，欺骗群众，用尽了卑鄙可耻的手段。

同期第二版，新北大公社工程兵部队、愚公移山评论员《赵金林同志为什么造反下山？》说：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老赵同志造反下山了！粉碎了牛辉林之流的迷梦，把他们一脚踢开了！我们得给牛辉林之流记上一功，因为井冈山中革命战士的迅速觉醒是有牛辉林们的一份功劳的，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当反面教员，历史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总有那么一天，他们会成为孤家寡人，光杆司令，在关帝庙的断壁残垣、枯藤昏鸦面前，茕茕孑立，形影

相吊的。

同期第二版，原井冈山兵团 5.1 纵队徐长根、周崇东《造反声明》说：

我们回顾几个月来井冈山兵团的“倒聂运动”，感到兵团的大方向完全错了。林彪同志说：“如果犯错误还装好汉，还要坚持到底，硬要钻牛角尖，明明有错硬说没有错，这是最蠢的人。”兵团总部牛辉林之流就是这样的蠢人。

牛辉林之流拉起山头，掀起大规模的倒聂运动，为井红翻案，为孔杨翻案，又一次企图推翻新北大红色政权。

井冈山兵团同志们，摆脱牛辉林之流使人愚钝的说教，起来造反吧。

同期第四版，本刊评论员《玩火者必自焚》说：

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却有几只苍蝇，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这就是曾经喧嚣一时的林杰反党集团，附加上林家铺子的小伙计牛辉林之流。

为了稳住阵脚，孔、杨、牛辉林之流在校内连续挑起了武斗事件。为了挑起更大规模的武斗，牛辉林之流早就派人到校外去集中受训，现已组成一支几百人的武斗专业队。【笔者注：据聂派成员著文稀稀拉拉披露，“校文革”麾下的专业武斗队，有“钢一连”、工人“铁锤兵团”、“李文忠学习班”、“第二期学习班”、“抗大班”、“临湖轩驻军”等等。文革结束四十多年，没见聶元梓和聂派指出“井冈山兵团”有任何一支有名有姓的“武斗专业队”；实际上，“井冈山总部”从来没有组织过武斗队，3·29 事件以后，各系自发守楼的“井冈山”学生，就被指为“武斗队”了。】

关帝庙捣毁了，王八菩萨垮台了，林家铺子倒闭了，山上群众纷纷造反了，而牛辉林的把兄弟，也已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牛头山上土崩瓦解，江河日下，一片混乱，

四面楚歌。牛辉林之流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悬在空中。于是，牛辉林之流只好用武斗来加深派性，稳住山头，安定人心。然而，牛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牛辉林之流曾因林老板倒台而表面平静几天，孔繁自称不再想“出头露面”了。如今，怎么样呢？

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动员起来！坚决粉碎牛辉林之流武斗的罪恶阴谋！

玩火者必自焚。牛辉林们如果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大规模的武斗，硬要冲入火牛阵，那么，“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未完待续）

【文摘】

我在文革漩涡中

——让历史告诉未来

聂元梓

牛辉林及《夜半抄家记》

牛辉林是北大文革期间的著名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两头冒尖。他当时是法律系学生，1966年5月25日，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后，陆平组织对大字报进行反击时，他积极维护校党委，表现非常抢眼。工作组进校后，他又积极靠拢工作组。但在辩论工作组执行什么路线的大会上，他却发言表示反对工作组。工作组撤走后，他找我和其他人一再表示，承认在大字报问题上的做法是错误的。不久，他组建了“北京大学红卫兵”，支持校文革的工作。1967年初在军训解放军的帮助下搞大联合时，由于他在5.25时的表现，许多人不同意他作为新组建的红卫兵的领导。他的“北京大学红卫兵红旗飘战斗队”没有加入“新北大公社”。“红旗飘战斗队”起初并没有打出反对校文革的旗号，只是和新北大公社闹对立。后来和我的分歧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吴传启的问题上，他是坚定地站在吴传启、洪

涛的一边，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井冈山兵团成立之后他一度成为第一把手。

牛辉林认为在北大内部分歧上，江青支持我，因而产生对江青的不满，几个人在一起议论江青。这个情况怎么传出来的，我不记得了。我和校文革、公社总部的一些人，认为抓住了牛辉林等人的重要把柄，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小集团，还抓了其中的个别人进行批判。现在看来，这都是非常错误的，我向他们赔礼道歉。

1968年工军宣队进校后，开始也把他们列为重点，组织了由宣传队领导、两派人员参加的专案组，还在东操场召开大会进行批判。到了1969年，由于毛泽东的发话，他的问题一风吹，专案组也解散了。在清查5.16运动中，他又成为重点，旧话重提，还加上新的内容。1971年3月2日，宣传队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坦白大会。我作为被批判和审查的对象，当时坐在第一排的中间（当然两边坐的是看守人员）。牛辉林第一个上台发言。坦白他的“5.16”罪行。牛辉林说：“洪涛发展我加入了‘5.16’”，“我攻击江青，还作了反军演说，在王、关、戚的操纵下在北大搞打砸抢”。他重点宣传不要搞攻守同盟，说：“那是建立在私字上的，是靠不住的。过去我把名单交给了洪涛，现在我把名单交给了工宣队。”

工军宣队认为牛辉林认罪态度好，给予从宽处理，他比其他被审查的人提前离开了北大。事实上，北大根本没有5.16。宣传队要搞出成绩，让牛辉林演出了这场戏。

1966年底，他带队抄我的丈夫吴溉之的家。我在《聂元梓回忆录》中记叙了这件事。我是被动地带路。这件事是我心中的结，永远抹不掉的结。我对不起吴溉之，对不起吴家。

大约在2007年，牛辉林想见我，通过中间人表达这个意思，还对文革的事表示歉意。那时校内外两派的人，很多来见我。牛辉林想来，我当然欢迎。见面后互相谈了近况，没有谈文革中的那些事，气氛是不错的。我没有想到过后他写了“夜半抄家记”并发表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上，网络上有大量转载。这篇文章谎言太多。这里把我致《炎黄春秋》的信和陈葆华丈夫致《炎黄春秋》的信列在后面，供读者参阅。

致《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杂志社：

贵刊 2009 年第一期所刊载的牛辉林《夜半家记》一文，是严重失实，恶意中伤的一篇文章，其后在社会上广泛扩散，不仅严重侵犯了我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同时还给我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

据我所知，《炎黄春秋》杂志是一份严肃的政经杂志，影响很大，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但不知此次为何不经调查研究也不加思考，听任造反派打武斗的头头牛辉林用一面之词对我进行人格侮辱和名誉诋毁，贵刊的这种做法对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毫无意义，更违背了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发展科学观建立和谐社会的方针。

对于这篇文章给我本人带来的名誉和精神伤害，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将保留对牛辉林本人及《炎黄春秋》杂志社诉诸法律的权利。

专此布达！

聂元梓

2009 年 5 月

附：一、国务院出版条例

二、我对《夜半抄家记》一文的意见

一、国务院出版条例

国务院 2001 年 12 月 25 日，出版管理条例 28 条，出版物内容不真实、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其出版单位应当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承担民事责任。

二、我对《夜半抄家记》一文的意见

2009 年第 1 期《炎黄春秋》刊登了一篇署名牛辉林的《夜半抄家记》，文中凡涉及我聂元梓本人在文革初期的人与事，大都是罔顾历史事实、随意剪裁取舍的伪历史，是凭空

编造出的一个是我指示红卫兵抄了我前夫吴溉之家的离奇事件。此文后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给我本人的名誉权带来极大伤害。在此，仅就牛文中的几处严重失实之处，加以指谬，来还原历史。

其一，牛文中一开始就绘声绘色地说，1966年12月下旬的一天，是我指示北大校文革副主任姜同光，叫牛辉林派人来替我撵走在我家闹事的以吴溉之子女为首的一伙红卫兵。当年的事实是，我知道吴溉之儿子和两个学生有一天上午曾到我家来过，当时我不在家，回家后是保姆告诉我的。此后，我也不知道也没见过吴溉之的子女带领过一伙红卫兵来我家闹事。我的儿子当年上学也在家中居住，他也没见过这伙人，如果见到，青年人相遇肯定会争执起来的。所以，我不知道牛辉林是如何用大汽车把这伙人在什么地方给拉走的这件事情。

其二，牛辉林七次提到的“聂元梓的秘书、哲学系青年女教师陈葆华”。陈葆华不是我的秘书，也没有陪我到牛辉林的“北大红卫兵总部”办公室（当时叫红卫兵联络站），所以也根本没有牛编造的我对他那长篇谈话。还说我“请示了中央让北大派人把兄妹俩送到中南海去，交给总理和康老负责教育”。好大的谎话啊！毛泽东有儿媳在北大上学，因江青在北大一次群众大会上讲家务事，逼跑了邵华姐妹二人。他们在外给我写信说生活困难，要求解决，我都不敢找总理，我找了谢富治，谢富治怕得罪江青，指示叫我写信给总理，由他交文秘转呈。吴溉之的子女有什么理，有什么资格叫总理和康生管教呢？何况，我哪有中央的电话？随时可以给总理等中央领导人通话，甚至中央开紧急会议怎么可能都会告诉我呢？造谣都造到天上去了，只要稍微思考谁都不会相信！不过牛辉林此人善于编造假话制造谣言，说的细微末节，有声有色，在墙倒众人推的情况下确能迷惑一些人呢。陈葆华是2008年去世的，他的丈夫米贵山同志在《炎黄春秋》杂志第二期“来函照登”指出牛文七次点名我亡妻陈葆华，为此提出四项声明，足以证明牛文的虚假编造与无中生有不是我一家之言的孤证。陈葆华根本没有和我一起坐北大的华沙牌小轿车去中南海北门外接牛转送吴溉之子女带路回家管教，更不可能叫陈葆华向牛传达“聂元梓要你们把吴溉之拉

到中组部门前批斗”等一系列的情节。其次，牛辉林抄吴溉之家的全部情况，陈葆华当事后即向我详细汇报过，牛辉林说是我叫他抄吴溉之家的，那你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在北大我没有听说过有人叫“牛司令”的。我不知道什么车叫吉姆车，中年司机是谁？叫“司令坐吉姆车回学校怎么样”？你坐上车回北大，你把车弄哪里去了，为什么至今不交代吉姆车和红电话机的下落，这是国家的财物啊。当时，陈葆华之所以跟着前去，就是怕牛辉林做出过激行动，出大问题。当时吴溉之由儿媳（穿着军衣）搀扶着，看管牛辉林抄家的行动，吴的文件柜和内部红色电话机，因为涉及国家机密，早先已经被单位查封，倒是牛辉林提出还要启封检查文件柜，被陈葆华阻止。陈葆华生前近几年来看望我时，又详谈过当时的事实真相，在座的有刘淑君作证。决不能因为当事人的去世，而肆意编造另一套历史文本。

其三，我和吴溉之无冤无仇也没有不和之处，我不知道单位审查他什么问题，我与吴溉之离婚是党组织决定通知我的，正如我第一次婚姻，也是党组织通知我离婚的，都有人可证明，我没有发现吴溉之有什么政治问题，但党组织的指示我不能不听从。我从来没有说过吴溉之是“彭（德怀）、黄（克诚）分子，大黑帮”只有牛辉林这样说，我还没有听到第二个人这么讲过。抗战时期我们在前方都是在彭总的领导下与敌人战斗的。黄克诚不仅是我的老领导还是我的救命恩人，战争期间一次患病，无医无药，还是他派军区吴大夫给我紧急开刀挽救了生命，而且我与他的夫人康棣华同志在一起工作，她是区委书记，我是副书记，我怎能说他和彭总都是大黑帮呢？

其四，在牛辉林文中，我简直成了一个品质恶劣的小偷，不仅偷走了吴溉之的古董珍玩，甚至连笔墨纸砚都不放过。凡是熟悉吴溉之的亲朋好友都知道，吴本人是从来不玩古董、不写毛笔字的，又何来的古董古玩与文房四宝？文中还有刘亚楼将军送给吴溉之儿子结婚的珍贵礼物“一支女手表”，我从吴溉之手中拿走，故意摔坏后才交还。事实是1965年我到吴家后，他的儿子已经结婚，住在院里的东厢房，这手表还能放在吴溉之手里吗？在牛辉林文章中，他还把我聂元梓形容的如此不堪，贪图钱财。又说：“聂元梓度日如年，

又千方百计想调离北大。认识吴溉之老人后，便把调离北大给老人当秘书作为嫁给老人的条件”。其实，吴溉之本人只是一个普通的高级干部，家里只有一位司机，一位厨师，没有其他工作人员，也没有警卫，更没有警卫军官。牛辉林又有什么证据来说我是拿自己的几十年的革命工作历史作为婚姻交换条件的？吴溉之应不应该有秘书和我的工作都是由党决定的，不是我个人说了算。

其五，最为可笑的是，文革期间同样也是大名赫赫的一个造反派、后来还坐上“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领袖交椅的牛辉林，却在文中把自己描述的如何如何好，简直成了主持正义、嫉恶如仇的正派人物了。如见了我不几次都是“没好气”，“心中充满了对聂元梓的为人的反感”和“疑问”，当时就能意识到“聂元梓是一个品质不好的人”，从此加入了“反聂一派”云云。好像他自己是一个清白无辜的被利用和抵制错误路线的先知先觉一样，这哪里像一个本应该敢作敢为的男人所说的话，也说明他所缺乏的正是一种直面历史的诚信与做人所需的基本准则。

其六，牛辉林说吴溉之给我写信要我交回偷他的贵重物品，这封信专派他儿子送给我，但为什么从那天下午一直到晚上，在我家所谓闹事，为什么不拿出来交给我呢？甚至连口头讲都没有讲这件事。当你们将吴溉之子女送回家，还在院子里被你们看管着没有和吴溉之见面时，吴溉之竟然知道信还在他儿子口袋里装着，把儿子叫到屋里给你念这封信，捏造这样的谎言，能使人相信吗？

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四十三年了，有很多历史的真相有待继续挖掘澄清，但回顾历史，决不能如牛辉林一样推卸责任，撇清自己，像打死老虎一样，把一切污泥浊水都泼到别人身上。北大的武斗是怎样发生的，甚至扬言让武斗升级，用枪炮打，有三十八军支持。这些事件是怎样被谁制止的，毛泽东主席“七·二八”召见时曾讲：“你拥军是对的，反谢（富治）是错的，你们派人到三十八军这事做得好”。这是永远抹不掉的事实，在这些事实面前毫不反思。本属于我个人承担的历史过错，曾经戴“罪”之身早已经承受过了。但我今天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名公民，我们的社会又是一个法治社

会，所以，不能再任由别人来随意诬陷、无罪加罪了。对这篇严重失实、充满诽谤的文章给本人所带来的名誉及精神损害，我将保留对牛辉林本人以及《炎黄春秋》杂志社，诉诸法律的权力。

陈葆华爱人米桂山致信《炎黄春秋》

对牛辉林《夜半抄家记》一文做出四项更正

《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刊登的牛辉林《夜半抄家记》文中，七次点名我的亡妻陈葆华。为此，现提出四项更正。

一、牛文将陈葆华的名字错写为“陈宝华”。

二、陈葆华从未担任过聂元梓的秘书。

三、事发当晚，牛辉林等红卫兵带着吴溉之两子女的大轿车到了“校文革”组织组时，陈葆华才知道是要扭送吴的两子女到中央。她是为了防止出事，才自动乘上大轿车随红卫兵们一起出发的。此前陈葆华对此事一无所知，更无牛文中提到的：陈葆华向牛传达“聂元梓要到哲学楼亲见牛辉林”、陈葆华“随同聂元梓到红卫兵总部办公室”的事。陈葆华既乘上大轿车，自不可能“是和聂元梓一起坐着北大的华沙牌小轿”去吴溉之家。

四、在牛辉林等抄吴溉之家的全过程中，陈葆华为了怕出事，都是和同学们在一起，观察他们抄家活动的。她根本不可能如牛文所述：陈葆华往来于聂、牛之间，向牛传达聂元梓下达的什么“任务”或指示之类。（此信刊登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来函照登”上）

米桂山

张木生的《山西出了个牛辉林》一文

有多处与北大文革的历史事实不符

张木生写了一篇《山西出了个牛辉林》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对牛辉林大加赞赏，颇有影响。牛辉林值得赞扬的地方，就该称赞。但该文的作者对北大文革的了解是很片面的，文中有多处与北大文革的历史事实不相符合。不过，作者在描述牛辉林与谢静宜的对话时，确实把牛辉林这个人物写得活灵活现。一个头脑灵活、真实的牛辉林也许就是这样的。下面是这篇文章的节选——

牛辉林可是一个传奇人物。1967年，他是北大法律系的高材生，面对北大的聂元梓头顶毛泽东所封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啊”的光环，背后有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撑腰，22岁的牛辉林，敢于向聂元梓叫板，组建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北大校长周培源、季羨林等老先生都投到牛辉林麾下。那时，北大师生总数大约一万二千人，除了大量的逍遥派，和为了工作、工资不敢“上山”的部分教职员工，大部分人都加入了井冈山兵团。牛辉林成了风头最劲的人物，反对派索性把井冈山戏称为“牛头山”，并把牛辉林称为“寨主牛司令”。牛辉林确实有超凡的组织能力，在人才荟萃的北大，他能组织五千人的队伍，如果搞一人一票的竞选，牛辉林也能当仁不让地当选校头儿、省头儿、国头儿。代价是天下大乱，国将不国。

牛辉林也确实有勇有谋，为了抵抗聂元梓对老干部、老教授们的迫害，他把周培源校长等一批人在北京西郊藏了起来。周总理为保护周培源校长，指名要周培源率科技代表团出国访问，只有找牛辉林才能找到周校长。牛辉林是最早敢于独立思考的践行者，认为江青和林彪都是会将中国引向邪路的党内野心家，这可以从毛泽东关于牛辉林的评价中得到印证。

1967（引者注：原文如此）年7月28日，毛泽东为了结束全国的武斗，从北京的大学入手，派军人和工人进驻学校，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进行了五个半小时的谈话，有七

八处谈到对牛辉林的看法和政策。毛主席的原话如下：“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上山，有自由，我们不勉强，不要污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可以不提杀牛宰猴炖羊肉了。牛宰了干什么？牛可以耕田嘛！你们列举的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可以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里讲讲嘛，又没有到外面贴大字报。”这里所说的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青，羊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七位签名人之一，哲学系教师杨克明。

中国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一斤瓶装不下二斤醋，一条板凳上坐不下两位先生，一山更不能容二虎。两个女人一台戏，校内有聂元梓老佛爷，校外那厮更厉害——“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

牛辉林先是无意间冒犯江青。1967年9月，周总理主持会议，每个学生组织代表发言五分钟。牛辉林就北大两大派斗争讲了五分钟准时结束，周总理鼓励再讲，牛继续发言。江青突发淫威，纤纤细指，尖尖嗓门：“你凭什么多占时间！”牛答：“总理让我继续汇报”，江青拂袖而去，牛心中一震，调整情绪又讲了三分钟结束。在过道里，牛辉林被叶群叫住，笑嘻嘻问牛辉林：“小鬼，哪里人，家庭、年龄？”最后一句，“你胆子不小。”别人诺诺，辉林谔谔。从此，江青到处说，“牛辉林是坏人。”

按说毛主席对处理牛辉林有指示，可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毛“7.28”讲话后，解放军工宣队进北大，牛辉林三次被关押专政，前后数年。从此北大更加腥风血雨，天可怜见，“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知识分子多数都是被知识分子整死的，短短几个月投缢赴水跳楼者二十多人。牛辉林受尽欺辱摧残，生不如死，一天批斗三场，晚上也不放过，拧胳膊，扇耳光，拳打脚踢，眼镜碎裂爬在地上，蓬头垢面，破衣烂衫，身体从里到外，有内伤有外伤。牛多次请求，“送我去监狱！”打手回敬：“想得美！”

最近逝去的陈一谔《回忆录》中有最文明的北大那段最黑暗历史，陈被打得死去活来，他女朋友自杀。牛辉林的早逝，和陈一样，外伤可以养好，内伤留下隐患。一个北大，当时就有九百多个专案组，三千多专政对象。现在的极左派，公开为江青等翻案，认为“中国最大问题是没有将文革进行到底！”这样的混账话也有人敢说！

要不是1968年12月18日翦伯赞老先生夫妻被迫害自杀，引起毛泽东震怒，牛辉林的小命早完了。翦老先生文革前是北大副校长，全世界都知名的历史学家，解放前就秘密加入中共，被毛称之“鸿儒诤友”，毛曾邀翦老到家请教历史学。毛看到翦老先生的遗书后，派身边最信任的御林军8341部队进驻北大，由迟群、谢静宜带队，纠正北大“清队”的“扩大化”。

牛辉林有胆有识也确有大智慧。他紧紧抓住毛主席多次对自己的评价，引导迟群、谢静宜重新认识自己，掩盖自己多次在小范围内表露出对林彪、江青的不满，把自己打扮成就是一个无知的“土鳖”。“骨头很硬”的牛辉林如“骗蛋”后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以猛虎去深山，陷牢笼之中，摇尾乞怜”，比喻自己受刑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痛不欲生”，“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再三表明，这些暴行都是出现在毛主席对自己有明确指示之后。自己只是一个紧跟毛主席，永远跟不上的落伍者。迟群、谢静宜多次找牛辉林谈话，双方拉近了共识：“牛辉林有严重错误，但还愿意改正错误，牛辉林和北大的武斗没关系”。牛辉林认真观察，仔细分析，他认定最后解脱自己的突破口在谢静宜身上。牛辉林认真品味迟群态度的变化，现在已不说“罪行”而用“问题”，不说“认罪”、“交待”，而说“反省”、“检讨”。攻下谢静宜，自己问题上达天庭的机会就来了。

谢静宜在北大哲学楼，在她的办公室找牛辉林谈话，牛一身大汗淋漓地站到谢静宜面前。谢从座椅上站起来问：“大冷天的，你很热吗？”

“不是热，是见首长心里紧张得厉害。”

“紧张什么？我青面獠牙吓着你？”

“不是，我没想到，首长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就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毛主席委以重任”。

谢静宜笑了，“你这孩子，还挺会说话，坐下说。”

牛辉林让谢知道了，他出生在辉县解放军军营，父亲也是解放军，自己等于是谢静宜

的半个老乡。

谢静宜：“我知道了，你父亲30年代就是山西、河南大山里的八路军，北大武斗前，你已被江青同志点名，没资格指挥武斗。”

不久，牛辉林的专案组悄无声息地解散，牛也被放回自己班级监管。虽然后来下放到山西定襄县神山公社，从最基层干部干起，却又被北大派人押回，三次关押整整两年。1972年10月，林彪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一年后，杨德中亲自找牛辉林谈话放人，杨德中间牛辉林为什么不在审查结论上签字？牛说，结论上有“严重政治错误”一说。杨笑了：“今后还想入党？不简单，想得远，好，我在你结论上加上‘保留团籍’，就不影响你今后进步了。”

.....

牛辉林与我相识只有数月，英年早逝。“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牛辉林虽赍志而殁，但中国只要还有牛辉林者在，中国就有希望。（摘自《参阅文稿》No. 2014～36 <http://www.wsxm.net/article-27269-1.html>）

中组部为陆平等人的平反文件

1980年8月21日 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为所谓全国第一张大字报诬陷的同志平反的通知》（见《北京大学纪事》1998年版858页）：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抛出聂元梓等人的所谓“第一张大字报”，并组织人炮制《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诬陷北京大

学党委和陆平、宋硕、彭珮云同志，这是一起冤案。中共北京市委 1979 年 2 月已为北京大学党委和陆平、宋硕、彭珮云同志做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按照中央的规定，现将中共北京市委这一决定转发给你们，并请转发到县团级党委，以消除不良影响。

中央组织部 1980 年 8 月 21 日

这真是一篇奇文。“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抛出聂元梓等人的所谓‘第一张大字报’”。这样的措辞，恐怕文件的起草者，都认为是睁眼说瞎话。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的，第一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批示广播的。怎么到了 1980 年这些都变成了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呢？如此罔顾历史，意欲何为？

文革对中华民族是一场灾难。我们的人民尤其是领导者只有从灾祸中真正醒悟过来，认真总结文革并从中汲取教训，国家才有可能走向和谐、民主、公平、法制。把历史的责任往林彪、四人帮身上推的做法是十分荒唐和有害的。中组部这样的通知，只能给党抹黑。

高云鹏的遭遇让我不寒而栗

看到《记忆》上刊登的《从高云鹏的遭遇，看迟群之流的专制》一文后，我真有点不寒而栗的感觉：原来整高云鹏，就是为了把北大死人的事情给我坐实呀！如果工军宣队真的掌握了什么“证据”，那枪毙我就不足为怪了。

高云鹏说：“我被抓到汉中后，开始汉中并没有把我当成炸楼案件的当事人，因为当时他们调查的结果并没有我参与炸楼的证据。所以很长时间汉中当局并没有找我‘审查’相关的情况。倒是原来哲学系宣传队的指导员，后来是校宣传队副总指挥的魏银秋，整天找我谈话，谈了一个星期。内容是引导我回忆北大文革中的一些事件，都是要给校文革、

老聂强加罪名的。有一个要我‘回忆’的事件最具代表性。魏银秋启发我很久我都没有理解，后来他干脆告诉我：只要我配合他们‘搞清’一件事，明天就能放我出去，而且说他说话是算数的，是说不二一的。他要我说的就是40楼打死一个井冈山学生的事。情节要按他说的来‘交待’，即头一天晚上校文革在临湖轩开会，我参加了。会上老聂决定第二天让工人兵团到海淀镇去抓人。被打死的人就是这样被抓住打死的，事件是老聂策划的。我告诉魏银秋，我所知道的情况跟他让我交待的情节完全相反，事先校文革和老聂并不知道工人兵团在抓人。当天上午听说这件事之后，老聂和老孙的态度都是坚决制止的。直到工人兵团都撤回来之后他们还批评了有关人员。说这件事是老聂策划的不符合事实。我拒绝写这样的口供。魏银秋威胁我说，‘你不要命了？！’魏银秋说我是顽固分子，给我活路我还不走。我说正是因为你们要把我置于死地，我才非要说实话不可。我不能死了还给党找麻烦，对党不忠诚。就这样通过我陷害聂元梓的目的没有达到，但他们在北大却已达到了制造虚假舆论的目的。”

高云鹏坚持不作伪证，几乎给他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他和北大的许多师生员工一样，不畏强暴，不怕高压，在我十分困难的时候，宁可自己倒霉，也要坚持实事求是。他们这样做，在客观上保护了我。我感谢他们并将这一切永远铭记在心。

关于邓朴方致残问题的再说明

邓朴方在北大校内摔伤致残，我的“罪过”又增加了一条。这其中，有误会，也有讹传。如上所述，我曾经在给邓小平贴的一张大字报上签了名，犯了错误。但是，关于邓朴方在北大摔伤致残的情况，我根本不知情，我没有参与迫害邓朴方，我也没有理由迫害他。在选举成立“校文革”的时候，经过与王任重商量，我曾经动员群众把邓朴方选入校文革。这件事当时我还向邓朴方本人谈过，那时候邓小平已经是运动攻击的对象了，否则为什么让邓朴方进校文革需要对群众进行说服工作？再说，当时中央领导人在北大读书的子女很

多，他们的父母挨整的时候，我一个也没有搞“株连”，为什么单单会整邓朴方？

邓朴方在北大，是学生们把他关起来的，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时候，北大是干部子弟成堆，关于他们的事情特别难处理，我就是希望他们都走开，都从北大校园里走掉才好呢，省得麻烦，根本不会下指示把邓朴方关押起来。

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记载：“8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邓楠回来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不愿再接受凌辱，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

我以前写申辩，还有其他人写文章，基本上都是以毛毛的书为依据，说跳楼是在宣传队进校十天以后。

近来翻阅80年代我写的材料，邓朴方摔伤以后，他们班有两个女同学跑来告诉我：“我们要他交待问题，没有看好，他跳楼了。”这件事的负责人始终没有找我认错。思量起来，学生找我，说明我还在任上。现在我考虑这里可能有误。

北大俄语系64级学生郑克中在《聂元梓的另一面：爱护学生、保护档案》一文中写到：一天晚上，岑万红对我说：“邓朴方摔伤躺在医院里没人管，校革委会让各系轮流去照看，每个系两天，咱们系没有人愿意去，要不明天咱们两个人去吧。”第二天一早，我们两人来到北医三院，在三层楼走廊的一个拐角处看到了他。因为医院不肯收留他，所以把他搁到了走廊里。虽然同在一个学校，我对他也只是闻其名未见其人。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他是一位很英俊的小伙子，尽管脸色苍白，连鬓胡子长得挺长，但浓眉大眼，透露出一股英气。他的眼中似乎有些无奈与茫然。大部分时间，只是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和墙壁，不说一句话。从他身边来来往往的大夫和护士，没有人愿意看他一眼，好像他是一位传染病患者，避之唯恐不及。一位护士交待我们，每隔两小时给他翻一次身，怕生褥疮，然后就是接一接大小便。我们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和邓朴方说话，出乎意料，他没有拒绝。谈话中我们得知，医院没给他做手术，也没进行任何治疗，能收留他就已经是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了；问他为什么要走这一步，他说班里同学全都不搭理他，没人去看他，

被关起来之后，有的只是不停地让他交代和揭发他父亲……。我完全理解，人一旦陷入绝境，要是有人对他说几句安慰开导的话，哪怕是几句，也会唤起他的生的希望，然而却没有！问他今后打算怎么办，他说医院撵他出去，过几天他妹妹来接他。听得出，他的话语里充满了后悔。

季羨林教授《牛棚杂忆》中

很多涉及到我的事情与事实不符

北大的老教授季羨林出了一本《牛棚杂忆》，讲北大文革期间的事。在我主持校文革期间，由于当时的形势使然，和我自己的思想左倾错误，政治水平不高，以及对许多事情的盲目和无力，没有能够控制住北大的运动局面，使包括季羨林先生在内的一批北大师生受到各种错误对待，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和迫害，我愿意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推诿，不回避，愿意在这里向大家作出我的真切的道歉和永远向这些师生作深刻的检讨。尽管说，我并没有亲自指示对包括季羨林先生在内的任何一个北大师生进行批斗和迫害，但是，那一段时间里，北大发生的许多事情，我都应该作出深刻反省和检讨。

但是，季先生的回忆，其中一些段落，我看了以后，很不以为然。不仅因为季羨林讲的很多涉及到我的事情是与事实不符的，还在于他回忆往事时对待青年学生的那种态度。

先说《牛棚杂忆》中与我有关的内容。季羨林先生在书中，甚至还要使用“破鞋”这样的文革盛行的污言秽语来伤害我。当时周恩来总理就批评过这种对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的做法。可是，季羨林先生是做学问的人，现在还对当时反对我的学生侮辱我的人格的往事津津乐道。这太失水准。

说到我的其他事情，季羨林也是很多是弄错了的。他说我是新北大公社的头头，其实，我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更不是公社的头头。新北大公社有总部有委员，我没有参加这一派。我就是在校文革当主任。还有，他说北大成立了革委会，那是工、军宣队进校后的事。

当时北大根本没有成立革委会，北大是校文革，“校文革”就是领导运动，与全面负责学校事务的革委会不同。当时的情况是，“地派”占优势的学校，都成立了革委会，别的许多高校的革委会，也都成立了。北大该怎么办？我请示了周总理。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参加“五一”庆祝活动，在天安门上我请示周总理，要不要成立革委会。周总理说，学校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我领会周总理的意见，校文革是领导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至于办学校，将来还要有校长和校党委会。

季羨林说他之所以挨整，是因为得罪了我，这话不知从哪里说起。全校那么多人，拥护我也好，反对我也好，我哪里能都注意到啊。季羨林把新北大公社的群众做的事，都归到我的头上，口口声声是聂记“校文革”，这太不严肃，也不符合事实。虽说我是校文革的主任，但是，当时的那种局面，比较混乱，不要说是对立的一派，就是新北大公社，几千人，我都能管得了？他们做的事情就都应该归结到我头上？我犯的错误，我不推卸责任，但是，总不能把北大校文革时期的一切，都要我来承担吧。反过来，季先生曾经担任过“井冈山兵团”东语系的“勤务员”，难道能就此推论，他在任期间，东语系那些反对我的学生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季先生承担全部责任吗？

季羨林说他因为反对我而进了牛棚，这事我不知道，这是不幸且令人同情的。但群众整他，我当时确实不知道。连他参加井冈山兵团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怎么反对我，我至今还不知道。他说北大的群众组织两派之间没有原则区别，他与我的原则区别在哪里？他也参与了北大学子的两派斗争，还是“井冈山”在东语系的负责人，也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他为什么不对当年的“业绩”深刻反思呢？难道二十年之后，还仅仅把文革理解成我这样的“坏人当道”，他那样的“好人受罪”，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全然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客观地说，大家都参与了悲剧的上演，又都承受了恶果。痛定思痛，皆不堪回首！

我致“党史”责编，指出中共党史二卷中的不实之词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责任编辑

吴江、冯世平、李亚平、黄艳，你们好！

1月11日，从电视台《新闻联播》得悉“党史”出版，中央决定全党学习。12日，我已购书，对这一集体著作进行阅读。1074页“后记”中，你们期待提出批评意见。

现在从“党史”下册中，举三段有关我的内容，提出意见：

一、763页：“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于5月25日在校园内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发难。”

我们七人的大字报，是给宋硕、陆平、彭珮云贴的；贴在校园内；是针对校内运动的不同做法而言。“党史”763页归结为“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发难”，如此定性合适吗？文革前，学大庆有一句名言“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这是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法宝在工作中的实际运用。毛主席在理论上和众多时间上，谆谆教导党和人民谦虚谨慎，要听得不同意见，尽快改正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缺点错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警惕国家“变修”。党的决议，刘少奇、邓小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亿万革命群众都是拥护文革的。文革之乱，是任何人没有预料的。我们的大字报，是根据“516通知”，请示领导，具体针对陆平等个别人在校内公开署名发表的。763页注释康生对大字报的所为，这不是我们的事；毛主席指示广播我们的大字报，出乎我们的预料。大字报“全国发表”前在校内发生的事，请责任编辑们考虑：陆平召开会议，组织反击我们的大字报；凡赞同我们大字报的，都要检讨；又派副校长黄一然，要求我做检讨，要我把大字报撕下来……孰是孰非？陆平从铁道部调北大后，不是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学无术、简单粗暴，不深入基层、不妥善解决院系中有教育界特性的问题；在反右运动，已然扩大并已刹车时，他还要求在北大再多定“右派分子”、“白专分子”。陆平接受邓拓所言，把一些校内学术争论按“刺刀见红”作战；对敢于同陆平斗争的人，则是国际饭店“整风学习”，逼你“认罪”，下放走人轰出北大。陆平的用语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七人大字报就是在这样的积怨上产生的，我想毛主席对这些事也是比较清楚的。关

于周恩来“内外有别”的指示，那是大字报贴出以后的事。我再次请责任编辑，按毛泽东《矛盾论》中的论述：“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搞清来龙去脉，回复历史本来面目。

二、775页：聂元梓等人贴出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

关于上面的“攻击”大字报，具体内容已记不清。具体写大字报的人，是针对批资反路线，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等事例，写完后要我也签名。我就签上名，这种做法很不好。

谈一点邓朴方在北大的事。北大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时，与王任重商议，并与邓朴方谈话，有意吸收他任委员参与工作；在动员大会上，我做报告说过此事。表示我们对所谓走资派的孩子也是团结的，大人的事孩子不能负责，

1968年8月19日，工、军宣队进校掌权，我被开始批斗。8月底，邓朴方跳楼致残。居然对我的判决书，时间颠倒，还说成是我的迫害。这是何人指使？！

各种传说，更为可笑。有的报刊，引用毛毛（邓朴方妹妹）的文章，大意是哥哥伤后，医院闹派性，不给治疗。聂元梓知道后，打去电话，医院才应付治疗。

没有此事，也别美化我

三、775页：“11月中旬，在江青、陈伯达等授意下，聂元梓率人前往上海“点火”……”

上海“点火”说，请看我回忆录172-191页。

希望责任编辑正确处理“党史”段落。我随毛主席犯错误，某些不明真相或别有用心的人硬给我往江青反革命集团上靠。这些人是要给毛主席抹黑，还是要把水搅混？！

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颁布《出版管理条例》（中华读法报2003.11.5）第28条：出版物的内容不真实或者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其出版单位应当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我是1938年入党的90岁老人，文革十年挨整八年。正因为抵制毛主席的错误、拒绝江青等人的拉拢，子女受牵连，生活无保障，名不正言不顺，谁之过，谁之责？！

责任编辑党员同志，代我向中央反映。让我在党的90诞辰也心里畅快。

欢迎你们来核实问题。

祝工作顺利！

聂元梓

2011. 1. 19

我给《百年潮》写信指误,但他们不敢发

2010年10月,《北京大学校友通讯》论坛栏目刊登何洛、孟金文章《揭露〈聂元梓自述〉的种种谎言》(约2.6万字)。今年《百年潮》一、二期争鸣园地栏目,发表何、孟约2.3万字的《聂元梓回忆录指误》。两稿同为一文,作者姓名未变。2011年3月1日我已去信《百年潮》。这里对《聂元梓回忆录指误》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谈几点看法。

(1) 何、孟二作者掌握着我的文革笔记,怎样得来的?是合法渠道吗?我有记工作笔记的习惯。从1966年5月到1968年8月,我记了40余本工作笔记。宣传队进校以后,对我和新北大公社打压,前途堪忧。为预防不测,我将这40余册笔记本交给我曾非常信任的肖XX保存。在宣传队的高压下,他把它交给宣传队。从此它离开我的视线。这是我的私人财产,应当归还给我。请读者注意,它在何洛、孟金的手中。这40余本工作笔记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比我的回忆文章要珍贵、重要百倍。我宣布:当文革档案馆建成之时,我把它捐给文革档案馆。如果文革档案馆建不成,我把它献给国家档案馆,供学者借阅。这样的资料不能放在他们二人手中。请读者记住何洛、孟金,他们一人曾是北大的党委委员王效挺,是《北京大学纪事》文革部分的主编。

(2) 《聂元梓回忆录》稿先交国内出版社,被退回。2005年由香港出版。何、孟二作者冠以“海外出版”,是何用意?香港是海外吗?

(3) 陕西有位高工对何、孟文章大量引用《北京大学纪事》(王学珍等主编)评价是:“歪曲、造假比比皆是。”他在文中写到:“自4·13炮打谢富治以后,从中央到地方,从校内到校外‘聂元梓炮打谢富治,要夺市革委会的权’的喊声不断,也是谢富治多次整聂元梓的依据。直到1971-1973年,在清查516运动时,还以反谢富治来整聂元梓等。谢富治完蛋了,反谢的事从《北京大学纪事》中也就消失了。”“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一些人的思维还和迟群们一样!

(4) 反周总理事,这是最敏感的大事。法院和判决书都未涉及。1998年《北京大学纪事》第一版也没有涉及。王效挺等人挖空心思、拿捏历史,编造了几条,塞到2008年版中。举一个例子: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与“许维纲谈话纪要”的原文是:现在的形势反映了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这一次你们北大站错了队,你们站在了总理的一边。这是1967年6月中旬,北大校文革的领导人,看到“许维纲谈话纪要”以后,才知道有新文革、旧政府的说法。北大站在什么位置上,“许维纲谈话纪要”已经说的再清楚不过了。《北京大学纪事》杜撰:聂元梓说:“在揪刘火线的问题上反映出来旧政府机关与中央文革的矛盾……总理的意见是保守的,不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戚本禹是执行中央文革的精神的。”孙蓬一说“……我们还是紧跟陈伯达,站在中央文革的一边。”陈伯达的6.5讲话把北大搞乱,这时孙蓬一可能说紧跟陈伯达吗?

我两次到《百年潮》编辑部,接待人员很热情,也用心听我的讲话。众所周知的原因,不能登我的意见。

让历史告诉未来

几十年来,在形形色色的宣传工具营造的社会舆论中,我被描绘成反革命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十恶不赦的狂人和灾星。面对那些由重复了千遍的谎言和一面之词构成的所谓“内幕”、“真相”、“大事记”等等,我对于众口铄金之强大,流言杀人之可畏,有切肤之

痛。如今，九十五岁的聂元梓在这里告诉读者：谢谢老天的眷顾，我人还在！还在奋斗！

在这本书里，我不但要推翻种种强加于我的不实之词和罪名，冲掉泼在我身上的污泥浊水，也要为那些受我的罪名株连的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洗清不白之冤；同时，我还要向那些因为我在文革中犯错误而造成痛苦的人致以深切的歉意和忏悔。

由于年代久远，记忆力衰退，某些事件的全过程和细枝末节，我可能记不准确了，但那些主导性、决定性的情节和过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好在这些年来，许多历史学者，探本穷源，提供了许多斗争的史料。亲历北大文革的一些关键人物，敢于对北大官方的史料说不。综合了这一些，我才有可能出版这本书。既然当年置身政治漩涡，那么我的所见、所闻、所想、我的遭遇，我的命运，都不再是个人琐事，而成为那段历史的一部分。我有责任把亲身经历的那一部分历史如实地告诉今人和后人。

活到今天这把年纪，在这样的处境下，能否开脱同江青、林彪、康生之流的“黑关系”，对我个人还有什么利害可言？我既不会再度坐牢，也不敢指望能得到平反或补偿。我只希望说真话，让历史恢复它本来面目。

文革到今年已经五十年了。众所周知的原因，对文革这段历史，现在的中青年人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就是年长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我们党过去的好几十年的真实历史又能知道多少呢？

长期以来，北大的文革历史，被某些人歪曲为“反聂”和“保聂”的斗争。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近几年来，一些当年北大文革的亲历者勇敢地站出来了。他们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并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史料，写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文字，为恢复北大那段历史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对他们的辛勤劳动，我非常钦佩。我在本书的附录中，列出部分文章，供关心北大文革历史的仁人志士参考。

科学、准确、全面、深刻地总结历史及其对现实和未来的意义，有待于开放档案，特别是实现宪政民主，实现言论、出版自由，使我们这些亲历文革的人，都能说出真话、实话，把自己的脚印留下，以供后人研究总结出深刻的经验教训。

我盼望所有真诚的读者——今天的、未来的，能够透过我的回忆，接近历史，反思历史。若如此，我也就如愿了。

在此，我要感谢那些在我十分困难的日子里，对我同情、理解和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他们中有北大和外校的师生（他们在文革中支持我或反对过我）；有我在狱中遇到的正直善良的看守人员；还有一些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也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对我的理解和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刘淑君、胡宗式、章铎，他们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细致而艰苦的工作。感谢已故的刘蓓蓓女士、赵建文先生为本书提供珍贵的史料。感谢高云鹏、李清昆、陆水林、孙月才、宫香政、王复兴、谢定国、张橙华等许多同仁为恢复北大文革历史所作的艰苦工作。感谢和怀念我的战友孙蓬一，他不只是对中央文革、谢富治、迟群之流的斗争中，旗帜鲜明、不屈不挠，他也留下许多珍贵的原始资料，成为本书的重要依据之一。

我很喜欢“让历史告诉未来”这句话，请允许我借用它作为这部书的结尾。■

2016年7月

【资料】

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总部

《关于目前形势的第二号严正声明》

《新北大报》1968年3月19（第一版转第三版）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天才领导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正以翻江倒海卷巨澜的磅礴气势向前发展。“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世界革命的中心，祖国的心脏北京，形势更是空前大好。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亲自领导下，新生的红色政权——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委会，粉碎了聂式家族、郑家黑店等叛徒集团、王关戚穆林反党集团以及各式各样的阶级敌人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的猖狂进攻。经过一年多来的阶级斗争急风暴雨的洗礼，更加完善，更加坚强，更加巩固了！

陆平保皇党和坏人孙蓬一之流把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描绘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把新生的红色政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打成彭真反党集团一样的白色政权，打成国际饭店式的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为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作反革命舆论准备，必须彻底批判！

（二）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越接近全面胜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越是尖锐、越是激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对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阶级斗争的盖子要不断地揭，要把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过去，乱敌人，乱敌人！

林副统帅去年八月九日的重要讲话与中央首长今年2月21日对天津代表的讲话，中央首长3月11日、15日、16日和18日的重要讲话，给我们分析当前北京高校阶级斗争的形势指明了方向，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扫除求稳怕乱的思想，一刻也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进攻，进攻！

没有路线斗争观念，阶级斗争观念就是抽象的，不彻底的。牢记路线斗争，就耳聪目明，在关键时刻就看得清，站得稳，顶得住，过得硬！只讲派性，不讲路线斗争是错误的。当前我们与陆平保皇党和坏人孙蓬一之流这一伙二月逆流派的斗争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当前，是紧跟毛主席，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召，迎头痛击二月逆流派的右倾翻案风，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还是追随谭震林之流，为二月逆流翻案，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对北京市革委会，破坏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这是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的立场问题！立场错了，一切皆错，干劲越大越糟

糕！（下转第三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内战争的继续。是国民党、共产党阶级斗争的继续。当前，一小撮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统帅、林彪同志为副统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瓦解人民解放军，推翻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目前在全国这股右倾翻案风已经成为主要危险。以一小撮叛徒、特务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为主要社会基础的二月逆流派就是这次刮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他们要全面否定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正确指示，他们要否定一年多来在中央文革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革命造反派的斗争大方向，也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我们同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斗争是一场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的大搏斗，是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搏斗，是一场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大搏斗。一切革命同志，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必须指出，陆平保皇党和坏人孙蓬一之流是当前北京市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中坚和骨干。他们抛出了2.15反革命小报，召开串联黑会，公开否定有二月逆流存在，为谭震林之流招魂；他们勾结聂式家族、郑家黑店以及李敦白、陈里宁、张本之流等叛徒、特务、反革命，伙同谭、江（一真）、季（宗权）反党集团，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对在反击二月逆流中旗帜鲜明的谢副总理恨之入骨，一次又一次刮起打倒谢副总理的黑风，妄图为二月逆流翻案，为彭罗陆杨翻案；他们全盘否定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他们的一系列严厉批评，要翻中央文革给聂元梓和坏人孙蓬一定的铁案。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彻底粉碎这一股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迫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当前阶级敌人总是用伪装革命的办法来反对革命，“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最近一个时期北京高校的二月逆流派作了十分充分表演，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从他们变化不定的形象中，不难发现有一只黑手在活动，他们为掩盖自己的退却，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用“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右派手法，把矛头直接指向以谢副总理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但他们越是装得

特别过火或公平，就越是暴露他们的狼子野心。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一切叛徒、特务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及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不论伪装得多么巧妙，都绝对逃脱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法网。伙同坏人孙蓬一密谋策划二月逆流派的串连黑会，破坏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的大叛徒、大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本被我专政机关依法逮捕，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伸向二月逆流的黑手必须彻底、干净、全部揪出来，只有斩断这些煽动派性，破坏革命大联合的黑手，彻底揭开北京高校派性斗争的盖子，经过乱，经过破，经过革，才能转化为治，转化为立，转化为胜利！

（三）三月十一日我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总部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的第一号严正声明”，我们重申第一号声明的严正立场：“在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在以谢副总理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直接领导下的首都高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始终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办事，取得了很大成绩，大方向完全正确！”陆平保皇党和坏人孙蓬一破坏高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破坏北京市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是一小撮叛徒、特务颠覆北京市红色政权、大刮右倾翻案风十分重要的一步！

“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是在彻底摧毁彭真反革命阴谋集团之后，彻底批判了北京新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关怀下，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胜利诞生的无产阶级红色政权。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须提高革命警惕，用战斗来捍卫北京市革委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权威。”对于北京市革委会的缺点错误应当从爱护的观点出发给予批评，北京市革委会内的个别坏人应当在整顿组织时加以清除，我们希望北京市革委会狠抓阶级斗争，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更加朝气蓬勃敢勇地率领群众去打仗，打大仗，打硬仗，打胜仗！陆平保皇党和坏人孙蓬一之流肆无忌惮地颠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必将自取灭亡！

“北京卫戍区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谁反对北京卫戍区、谁反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打倒谁！

以刘邓陶彭罗陆杨为代表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始终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打击对象。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继续深入广泛地进行斗批改，彻底清算刘邓陶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为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奋斗。

我们将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力量，为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英勇战斗到底！

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在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的统帅下，我国亿万军民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无比豪迈地向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光辉前景骄傲地前进！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推动革命的飞跃发展。

我们完全可以预言，一切在革命大潮中泛起的沉浮，一切垂死挣扎的阶级敌人，一切变色龙、小爬虫、乌龟王八、牛鬼蛇神，他们彻底垮台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而这个反革命队伍中的陆平保皇党和坏人孙蓬一之流的彻底灭亡的命运就在前面。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永远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勇敢地战斗！战斗！战斗！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进攻！进攻！不间断地前进！前进！前进！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资料】

聂孙之流就是不折不扣的“二月逆流派”

《新北大报》1968年3月22日（第二版转第三版）

1864 支队

最近，从无产阶级司令部传来了迎头痛击“二月逆流”新反扑的战斗号令。三月十一日接见会上，中央首长指出：“二月逆流”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指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必须予以迎头痛击。三月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代表时，江青同志又尖锐地指出：“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北京有学生要为‘二月逆流’翻案。”来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擦亮了我們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眼睛，使我们找到了运动的症结所在，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了。北大的问题难道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吗？不，它是全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一个缩影。

（一）二月逆流在新形势下的反扑

阶级斗争的现实教育我们：“越接近全面胜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越是尖锐，越是激烈”。在当前，正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总结一年多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实现革命大联合，斗私批修，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时候，被打倒的走资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预感到本阶级灭顶之灾的来临，按捺不住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刻骨仇恨，终于又一次跳了出来，蒙蔽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以极右的面目出现，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残酷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去年的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翻案。这是一股极为反动的社会思潮，是“二月逆流”在新的形势下的反扑，是阶级敌人临近灭亡前的回光返照。在这股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中，聂孙之流充当了什么角色呢？他们猖獗一时的反动气焰，证明了聂孙之流就是这股反动的极右势力在北大的代表人物。但是正象毛主席所说的当他们处于不利的情况的时候，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当我井冈山人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号召，奋起反击聂孙之流掀起的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妖风时，他们慌了手脚，一面往自己脸上胡乱涂些油彩，高叫什么“我们没有为二月逆流翻案”呀，什么“我们是反击二月逆流的英雄”呀，一面贼喊捉贼，恶人先告状，说我井冈山人是为二月逆流翻案。那么事实是最好的见证人，在事实面前，这伙丑类必将原形毕露。

（1）二月十五日在聂元梓的北大小报上，他们把反击“二月逆流”打成“关王林反党集团的阴谋。”受到了中央首长的严肃批评。

(2) 三月七日晚上，北大公社总部主持在办公楼礼堂召开了一个形势串联会，在这个串联会上，他们公然把去年反击“二月逆流”革命行动打成“湖南省无联”的反动政治纲领，他们咒骂“井冈山兵团至今还坚持反击二月逆流的主流是好的，不承认反二月逆流要害是炮打周总理”，他们把一张认为“反二月逆流大方向正确，阶级敌人的利用是支流”的大字报打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大字报”。还是在这个会上，他们极力标榜自己是为保陈毅、余秋里而作了英勇斗争的“英雄”。

在红旗兵团一个战斗队的一张没有来得及发表的大字报上，有这么一段话（大意）：在一月夺权之后，有一伙特务、叛徒……打着所谓反二月逆流的旗号，蒙蔽了一部分群众，猖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反对谭震林等“老革命”。

在北大校内，聂孙之流向井冈山兵团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猖狂进攻，妄图把在反击二月逆流斗争中英勇冲杀出来的井冈山兵团打成“反动组织”，在校外，把那些在反击二月逆流时站在二月逆流方面或者对二月逆流态度暧昧的势力，纷纷向在反击二月逆流冲杀出来的革命造反派发起反攻倒算，妄图把他们通通打成“关王林的私生子”，进而加以摧垮。

在××学院，以保余秋里同志错误著称的××公社，妄图否定在反二月逆流中作了很好贡献的北京公社；在师大，造反兵团妄图搞垮在反二月逆流中打头炮的师大井冈山和师大革委会；在民院，抗大公社借洪涛、刘郅问题妄图搞垮反二月逆流的东方红公社；在农大，保谭势力蠢蠢欲动，妄图借秦化农问题全盘否定在反二月逆流中一直顽强战斗的农大东方红和农大革委会；轻工红鹰也以自己过去保陈毅保余秋里为理由，要求给自己记一大功；在外交部，出现了一张为二月逆流翻案，向革命造反派反攻倒算的“九十一人大字报”等等、等等。

在这同时，那些妄图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人还一致把矛头指向了以谢副总理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北京卫戍区。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只要我们把这些事综合起来，加以分析研究，就可以发现，这是一股以聂元梓、孙蓬一出面指挥，以石油大庆公社、民院抗大公社、师大造反兵团为急先锋的一股为二月资本

主义复辟逆流翻案的妖风，是二月逆流在新形势下的反扑。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前这一场斗争的阶级实质，我们不妨翻一翻他们的历史，就可以更加证实“聂孙之流是不折不扣的二月逆流派”的结论。

（二）历史的回顾

（1）聂孙之流在二月逆流中的表演

去年一月夺权之后，那些以谭震林为代表的被打倒了的党内走资派伙同社会上牛鬼蛇神，为了恢复自己失去了的“天堂”，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有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同志也卷入了这股逆流。

在二月逆流中，聂元梓伙同坏人孙蓬一同样扮演了十分可耻的角色。在校内他们耍弄了无耻的资产阶级政客手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残酷地镇压同陆平黑帮，张承先坏工作组和王任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英勇斗争的广大革命造反派，向革命造反派实行疯狂的反攻倒算。在校外，到处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在农口，他们支持保谭派；镇压造反派；他们公社成立后的第一次社员大会，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谭大会；在农大，他们支持农大红旗，镇压东方红；在华北局，他们支持李立三反党集团，镇压华北局革命派；在广州，他们的《新北大》广州版发表了一篇大毒草《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成为广州市保守势力向革命造反派反攻倒算的号召书，被中央文革小组点名批判；在湖南，他们伙同湖南老保，疯狂镇压湘江风雷，他们参与了查封首都三司驻长沙联络站的武斗，把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驻长沙联络站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直到七月份中央已准备为湘江风雷翻案，北大公社总部还发表声明说长高司是革命小将，湘江风雷不能翻案；在武汉，他们伙同走资派，把武汉三钢打成反动组织；在山西，他们勾结刘志兰反党集团大反刘格平；在天津……，等等，等等。

（2）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期聂孙的表演

三月七日，师大井冈山公社打响了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炮，这一炮打得准，打得好。它得到了中央文革和谢副总理的坚决支持，也得到了全市革命造反派的热烈响应。

正当社会上轰轰烈烈地反击二月逆流的时候，北大正沉醉于围攻郭罗基同志大字报的热潮中。直到3月12日战斗团团长会议上，他们还说什么“现在打倒谭震林不保险，打李雪峰最保险”。同一天聂元梓在红代会核心组会上提出要打倒李雪峰，遭到大家拒绝，但她还不死心，于四月四日又以公社总部名义发表了个声明，把李雪峰同志打成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公开为二月逆流的真正急先锋谭震林开脱罪责。五月份，聂元梓竟狗胆包天，伪造最高指示，死保谭震林，陷害王震。这时，以原新北大公社02团和16团（即现在的井冈山02、16纵）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为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奋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炮轰谭震林时，公社总部头头打电话给二团，厉声问道：“你们为什么轰？无组织、无纪律，有没有公社总部？你们以什么名义轰的？”当02同志说明不以公社名义轰，以战斗队名义轰，有责任自己当时，公社总部头头说：“北大地位特殊，你们以战斗队的名义，别人也说北大表态了，都找上门来怎么办？”

另一方面，公社总部还派了他们动态组的王××到农口调查，这个王××一到农口，就一头扎进老保组织——农业部延安战斗团，伪临管会，反革命分子江一真，修正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左叶，大叛徒李夫（皆保谭派）怀里。全盘接受了他们的观点。

当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时，迫于形势的压力，新北大公社总部才被迫于3月14日发表了一个声明，被迫同意02团、16团参加一些活动。况且、当时参加农口支持造反派的活动都是02团和16团的同志参加，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北大“正统造反派”支持农口“斗斗批”，“非正统造反派”支持农口联络站。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也还没有放弃原来的立场，还继续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顽固地站在二月逆流派那一边。

请看下面的事实：在校内，孙蓬一扬言，反谭震林的不一定是造反派，保谭震林的不一定是保守派，大讲大叛徒谭震林光荣的四十年历史，并在谭的授意下，大反许世友同志。

继续对高举革命造反大旗的原新北大公社 02 团和 16 团实行反攻倒算，残酷镇压，这也是后来 16 团全体起义，02 团几乎全团起义，奔上井冈山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笑的是，新北大公社总部向中央汇报的一份材料中，竟然说什么在反击二月逆流中，他们是委托新北大公社红二团、红十六团派人参加批谭联络站的工作和支持农口被压制的革命派。可爱的先生们，我英雄的 02 团和 16 团同二月逆流英勇斗争的时候，你们“红二团”和“红十六团”（即十六糟团）还没有成胎呢？而在校外，孙蓬一之流赤膊上阵，疯狂炮打谢副总理。因谢副总理在反击二月逆流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支持了革命造反派，故被谭震林之流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孙蓬一之流炮打谢副总理的逆流正好适应了谭震林们的需要。于是谭就在四月二十四日受北大公社总部的邀请，派得力干将江一真到北大来谈判，双方一致认为：谭震林打不倒。北大公社方面并认为：对社会上搞谭震林、余秋里、陈毅都有些思想不通。他们对农口、对北京市的文化革命形势都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最后双方还达成协议，共同揪叛徒（江一真所谓揪叛徒主要目的在于借此从造反派中揪出几个坏人从而否定造反派）建立“内部动态”联系，让江一真派人每隔两天去拿一次“内部动态”。谭震林对农口“斗斗批”的第二号头目钱轶芳说：“要和北大联系，把希望寄托在北大”。在孙蓬一炮打谢副总理时，农口老保到处贴大字报、大标语“坚决支持新北大公社的革命行动”，并居然耀武扬威地打着大旗到北大来参加了几次大会。同时，新北大公社竟然在大街上刷大标语要“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受到了陈伯达同志的严厉批评。此后，社会上那些“拥护二月逆流派”就纷纷向北大靠拢，（如大庆公社，民院抗大，轻工红鹰，农口老保，等，充当了孙蓬一炮打谢副总理的马前卒），而那些反击二月逆流派（如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地院东方红，民院东方红等）就渐渐地成了聂孙之流的眼中钉。

（3）九月师大事件中聂孙之流的表演

八月底，中央文革清除了几个钻进来的坏人，即揪出了关王林反党集团，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中央文革一再指出，这是中央自己揪出来的，不要把关王林问题抛到社会上去，以防坏人钻空子。但是那些热衷于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人，那里把中央首长的指示

放在眼里？聂孙以为这下子可捞到了一根稻草。于是他们就把反击二月逆流打成“关王戚林的阴谋”，借机为二月逆流翻案。他们乘机把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打响了第一炮的师大井冈山及师大革委会打成“反革命”，进而把它搞垮，以实现他们为二月逆流翻案的罪恶阴谋。在这个事件中一贯保二月逆流的石油大庆公社和坏人孙蓬一之流都做了充分的表演，校文革副主任姜同光率领人马亲临前线督战，而在市革委会通过师大事件的通告时，只有聂元梓投反对票，妄图搞垮师大革委会。在这次事件中，农口老保更是欢天喜地。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一眼看穿了这些“二月逆流派”狼子野心，九月七日，中央文革发出了紧急通知：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二三月份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市革委会及时地对“专政委员会”采取了果断措施，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保卫了年轻的师大革委会。此后，聂元梓等人又一次受到了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并叫他们检查交待自己的后台。

总理：北京两大派，对师大，就要找借口，要把人家颠覆掉，内部有人，外部还有一伙人去煽动。……

伯达：你们一定要吃掉对方，对北师大就一定要吃掉人家，……大鱼吃小鱼。

江青：大鱼吃小鱼，北大聂元梓也去了。

（聂：没去，我们在家召开形势座谈会。）

江青：总之，你们是幸灾乐祸吧？……

九月师大事件是二月逆流新反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阶级敌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聂孙的阴谋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沉重打击下，终于可耻的失败了。

（三）结束语

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这些人中的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在当前，正当中央文革揪出了反革命两面派戚本禹时，正当无产阶级革命派总

结一年来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围剿派性，斩断黑手，实行革命大联合时，聂孙“拥护二月逆流派”又以为有稻草可捞了。一方面他们预感到革命大联合的实现，就是他们末日的来临，因此，聂孙就拼命破坏大联合，破坏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攻击解放军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另一方面，聂孙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借造反派围剿派性，作自我批评的机会，全盘否定革命造反派，进而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借中央揪出反革命两面派戚本禹的机会，大做文章，扬言要打倒谢富治，妄图搞垮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二月逆流翻案，以实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这是反革命行为！

但是，这些比驴还要蠢的先生们想错了。正当聂孙在做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疯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时候，无产阶级司令部向我们发出了迎头痛击二月逆流新反扑的战斗动员令，宣判了阶级敌人猖狂反扑的死刑！无产阶级革命派闻风而动，奋起痛击二月逆流的猖狂反扑，把阶级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焦头烂额，真是大快人心，人心大快！再回过头来，我们只要（1）把今年三月份发生的师大事件同去年九月的师大事件联系起来，再同师大井冈山在反击二月逆流斗争表现联系起来；（2）把今年三月发生的炮打谢副总理事件同去年四月炮打谢副总理事件联系起来，再同谢副总理在二月逆流斗争中的鲜明立场联系起来；

（3）把聂元梓在当前的表演同去年九月份的表现，再同去年四月份的表现以及反击二月逆流时期的表演联系起来看，那么，当前这场斗争的阶级实质不是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了吗？

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让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穷追猛打，把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彻底打垮。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打倒谭震林，揪出小爬虫孙蓬一！■

【读者来信】

赵晖谈 215 期“红色文化”

《记忆》215 期收到，启之先生对于红色文化的见解，个人深为赞同，如高华先生在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后记中所言，“予生也晚，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细读历史，站在20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共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史家对于红色文化的研究分析，亦复如是。■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邹 行